

20世纪一代圣洁的拓荒者

——巴哈伊信仰在中国、东南亚和远东地区

The Pure in Hear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ahá'í Faith
i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Far East

萧有发【著】

陈思宇【译】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出版说明

《20世纪一代圣洁的拓荒者》是一本了解早期那些具有牺牲精神和勇气的巴哈伊开拓者、最早期中国巴哈伊如何开拓新生活模式和重要事件的小册子，尽管着墨有限，但却是异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本社对本书原作“*The Pure in Hear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ahá'í Faith i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Far East*”的译者所提供的译文表示衷心感谢。在此基础上，本社做了大量的人名、地名、事件等译名的审译、校核工作，今以电子书的形式，为广大巴哈伊朋友以及研究者们提供这一段巴哈伊信仰在中国、东南亚和远东等地区的早期发展历史文献。

如本译文有不当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15年5月

献给马来西亚第一位接受启示的巴
哈伊信徒袁其良叔叔（Uncle Yan Kee
Leong），以及我的妻子萧莫娜（Mona）
和女儿萧滢慧、萧滢金。

萧有发

巴哈伊信仰主张上帝唯一，确认其先知的一体性，谆谆教诲人们有关全人类一体的信条。巴哈伊信仰阐述了人类一家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并声称这一切正在逐步由理想变为现实，且主张只有上帝的变革之灵借由其今日特选代言人的努力践行，才能最终使其实现。此外，巴哈伊信仰还要求其信徒首先应独立地探求真理，谴责各种形式的偏见与迷信，主张宗教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友爱与和谐，坚信宗教本质上与科学的和谐一致，认定宗教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发展的首要力量。巴哈伊信仰明确主张男女平权、机会均等、待遇相同的原则，始终主张推行义务教育，消除极端的贫富差距，废除祭司制度，禁止奴隶制、苦行主义、行乞和隐修制度，规定一夫一妻制，劝阻离婚，强调信徒必须严格服从自己的政府；将一切本着奉献精神而投身的工作都提升到崇拜上帝的地位。巴哈伊信仰呼吁创造或选定一种辅助性世界语，并勾画出应建立的维护普世和平的这些制度的蓝图。

守基·阿芬第

目 录

序言（一）

序言（二）

致谢

一 亚洲的背景

二 中国，中国，到中国去

三 早期的传导者

四 最早到达中国的巴哈伊

五 更多巴哈伊抵达中国

六 早期的华人巴哈伊

七 玛莎·鲁特和中国早期的巴哈伊

八 最后的岁月

九 新纪元的开始

十 东南亚

十一 港澳台等地区

十二 “智慧种族”

十三 中国——最后的处女地

参考书目

作者简介

社会简评

序 言（一）

一个多世纪以来，巴哈伊信仰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的确引人注目。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信仰已经在地球上众多国家和地区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其传播国家的数目仅次于基督教。然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所固有的环境，东欧国家和苏联人民不大容易接触到巴哈伊信仰的教义。这些国家连同人口超过十亿的中国，总人数约占世界的四成。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东欧国家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瓦解，宗教自由的践行成为一种可能。在1989年至1990年的两年间，巴哈伊信仰的传导工作在这些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阿什哈巴德、布达佩斯、莫斯科、基辅和布加勒斯特成立了一系列巴哈伊地方灵理会。人们发现这些在过去几十年来被剥夺了宗教自由和权利的人民，原来十分渴求使生活更加充实的灵性价值。

然而，中国在宗教问题是极为复杂而矛盾的。一方面，据说中国有着宗教自由，同时，它的实际情况又充满了不确定性。虽然我们确信巴哈欧拉^①所主张的社会和经济原则

① 巴哈欧拉，原名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巴哈伊信仰的先知和创始人，上帝在现今时代的显圣者。1817年11月出生于波斯（今伊朗）马赞达兰，1892年5月29日在巴勒斯坦（今以色列）仙逝，享年74岁。祂用阿拉伯语

正是中国所需要的，也是中国人所一直追求的，但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既不能触犯中国人的情感，也不能使信奉巴哈欧拉的中国人受到影响。

不管怎样，中国人民有权了解我们赖以生活的原则，同时我们的宗旨是为了在不触犯任何当地法律的情况下，让中国人随时随地了解我们的信仰。在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已经有了大量真正的巴哈伊社团。最近，人们强调接近这个高贵种族中居住在大陆以外地区的成员。为了促使这项事业顺利进展，萧先生在这本书中就巴哈伊信仰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中的重要事件作出了集中阐述。希望这些努力能为那些有意向中国人民传导之人——无论他们身处何地——提供启发和指导的资源。

休·E.钱斯（Hugh E. Chance）^①

1990年9月，于海法

和波斯语启示了无数带着神迹光芒的书简和典籍，其中涉及宗教天启、伦理学、教导、道德、政府、教育、环境、哲学、社会、经济和科学等诸多问题。

① 休·E.钱斯，世界正义院成员（1963—1993）。

序 言（二）

写一篇关于中国早期巴哈伊传播^①史的文章的想法源于1989年上半年，当时我有幸在第二届巴哈伊中国传导会议上发表关于这个议题的演讲，该会议于同年7月在西澳大利亚州的珀斯市举行。此次演讲的内容包括早期中国信徒以及在中国、东南亚和远东地区参与对中国人传导的巴哈伊。我续写了这项议题，并于1990年4月在西澳大利亚州珀斯市莫道克大学举办的澳大利亚巴哈伊研究会全国大会发表了这篇文章，而将这篇文章及所附照片独立发表出来的想法则是会后由该研究会促成的。鉴于巴哈伊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和拓展，发表这篇文章最主要的目的是激发人们对巴哈伊信仰在华人中的传播事业的兴趣。对于巴哈伊信仰早期历史的记录也同样重要。上帝之圣辅A.Q.法伊齐（A.Q. Faizi）先生曾对O.Z.怀特海（O.Z. Whitehead）先生这样建议道：“记录你所参加的一切巴哈伊活动的经历。不久，人们会希望了解巴哈伊，不管这些巴哈伊的身影是多么模糊。任何人所写的每一句话都非常宝贵。”^②这些话让我深受鼓舞。

① 中国早期巴哈伊传播，巴哈伊术语，指向中国人民传播巴哈伊信仰。巴哈伊信仰并不允许劝诱人们改变自己的信仰。

② 参见O.Z.怀特海《西方世界的早期巴哈伊》（*Some Early Bahá'ís of The West*），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6年版，第9页。

本书试图向读者介绍那些具备自我牺牲精神和勇气的巴哈伊拓荒者以及中国巴哈伊信徒的生活和重要事件——他们为了推动巴哈伊事业，漂洋过海来到如此遥远甚至是危险的地方。由于目前的信息比较有限，所以一些人物和事件的背景介绍比较简单。这篇文章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打算在华人中传播巴哈伊信仰的人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萧有发

致 谢

我要向巴哈伊世界中心表示衷心的感谢，当我和妻子于1986年拜谒圣地的时候，中心向我提供了记录着巴哈伊在中国大事记的复印本，这些信息为我撰写本书奠定了基础。许多关于玛莎·鲁特（Martha Root）的细节来自于M.R.加里斯（M.R. Garis）撰写的《玛莎·鲁特——神圣殿堂前的雄狮》（*Martha Root: Lioness at the Threshold*）和多卷期的《巴哈伊世界》（*Bahá'í World*）。

我要感谢澳大利亚巴哈伊研究会给我提供了出版本书的机会；感谢世界正义院^①的研究部为我提供一些研究资料和早期中国巴哈伊信仰者的照片；感谢我的妻子莫娜对我的鼓励、帮助和提议：将这本书命名为《20世纪一代圣洁的拓荒者》（*The Pure in Heart*）；感谢安东尼·坦普尔（Anthony Temple）先生在照片制作过程中对我的帮助。我尤其感激迈克尔·戴（Michael Day）先生对手稿的校订和所提出的很多有益建议。同时也非常感谢来自约翰·福斯达（John Fozdar）医生（中国巴哈伊国际社团对华委员会、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理会、香港巴哈伊总灵理会、国际华人传导委员会顾问）和格雷厄姆·哈索尔（Graham Hassall）博士的宝贵

① 世界正义院，巴哈欧拉在《亚格达斯经》中命定的巴哈伊信仰教务管理的最高机构。世界正义院驻地处于以色列海法的卡尔迈勒山上。

建议。

同样感谢纳塔利·劳奇（Natalie Louch）女士的贡献，她提供了印尼第一个中国巴哈伊的一些信息，感谢吉显江先生向我提供了台湾巴哈伊总灵理会的最早一批成员名单。

更衷心地感谢黄元环女士多年来的努力令本书的中文翻译终能完成，以及陈思宇女士的翻译、雷雨田教授和鲍景超先生的编辑与修润，还有马和平（Vargha Mazlum）先生和新纪元国际出版社出版的电子书，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本中译本便无缘面世。

萧有发

一 亚洲的背景

在我们的生活中，历史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它向我们展示了对未来的洞悉。同样，早期巴哈伊信徒在中国、东南亚和远东为弘扬巴哈伊信仰所作出贡献，对于当代巴哈伊信仰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可以进一步在其传导事业上启发和鼓舞他们。我们需要对华人传导事业的发展及巴哈伊社团在这些地区的演进进行了解，只有这样，未来的巴哈伊社团才可能获得簇新的概念，取得更广阔的前景。回顾过去，有助于我们展望未来，为巴哈伊在上述地区建立巴哈欧拉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方向。

需要接触巴哈欧拉信息的人数庞大，面对要向他们传播这艰难的任务可能会使巴哈伊信徒却步，然而巴哈伊圣作里保证，只要他们奋起服务，就会得到各方佑助而大获全胜。在人类不断成熟的进程中，中国人民的精神净化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阿博都-巴哈^①（‘Abdu’l-Bahá）曾经宣告“中国是未来的国家”，祂“希望适当的教师能受鼓励而到广大的国家，建立上帝王国，促进神圣文明的本质，并高举

^① 阿博都-巴哈（1844.5.23—1921.11.28），巴哈欧拉的长子、指定继承人及其作品的诠释者。巴哈欧拉授予祂“至大圣枝”、“上帝之奥秘”和“教长”的称号。1911年祂开始了欧洲和北美的旅行，宣扬其父亲的启示。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祂对缓解巴勒斯坦地区的饥馑所做的服务和努力，1920年英国政府授予其“爵士”称号。

巴哈欧拉圣道的旗帜去邀请人们参加上帝的圣宴!”^①

早期的巴哈伊创造了历史，当代的巴哈伊如果响应号召加入到服务领域，他们也有机会为未来的巴哈伊提供启迪。守基·阿芬第^②（Shoghi Effendi）——巴哈伊信仰的圣护^③——鼓励“东西方的朋友共同加入这一领域。他们要唤醒并复苏中国大地——这个国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文化，其人口数量占地球的四分之一，在物质、文化和灵性资源与潜力方面冠绝世界，它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他们要将这个广袤而庞大的国度置于上帝圣道的庇荫下，使其国民与世界其他民族携手一道，昭示真正的人类一体，它的实现只能借助于巴哈欧拉的威权”^④。

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上半叶，中国、东南亚及远东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处于一种变化莫测的状态。新的行政组织和政治制度形式、对现行社会秩序的变革和重建经济的想法和理念正在这里不断推行。在中国，大量改革运动受到了许多改革者、作家、知识分子及诗人的鼓励和支持。康有为（1858—1927）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出版了不少令人关注的作品，1902年出版的《大同书》^⑤便是其中

① 参见《西方之星》（*Star of the West*）卷十三，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

② 守基·阿芬第，阿博都-巴哈的长外孙，1897年3月1日出生于阿卡城，1957年11月4日于伦敦去世。阿博都-巴哈在遗嘱里指定守基·阿芬第为“上帝之道的圣护”和“上帝圣言之诠释者”，1921年，阿博都-巴哈去世后，守基·阿芬第继承了祂的事业。

③ 根据阿博都-巴哈的遗嘱，出于对巴哈伊圣作的权威诠释、出于对巴哈伊信仰的关爱和守护的需要，创立了圣护制。

④ 参见1923年1月23日守基·阿芬第写给东方巴哈伊的信。

⑤ 《大同书》，1902年康有为在印度大吉岭完成的作品。

之一。这是一本比较兼收并蓄的乌托邦式的作品，提倡对迅速崩溃的中国传统社会进行改革。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强烈主张这样的信条：让人类亲如兄弟，国家团结如一，唯有如此，才能终结由于奴隶制、等级制或贵族和封建制度残余所导致的等级差别和社会混乱。康有为的思想被其他作家及思想家接纳，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正在探索新时期能够满足中国需求的新思想和新启示。然而，给20世纪早期的改革运动和中国人的思想都带来深刻影响的革命性的知识分子，却是学者兼作家的陈独秀（1879—1942）和李大钊（1889—1927），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首要的共同创始人。他们主张：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化并恢复强国的地位，中国必须完全履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他们所采用的新的社会政治思想最终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制度。

接近19世纪末的中国，由于其内部官员不和、决策者目光短浅以及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倾轧，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中国很快变得落伍，尤其是与科技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1912年1月12日，随着末代皇帝溥仪的退位，中国进入了共和时代，结束了268年的满清统治——其最典型的特征是男人被强制留辫子。

19世纪30年代，作为挽救贸易失衡的一种手段，英国向中国出口大量鸦片。由于中国百姓对这种新型毒品的上瘾现象越来越严重，中国政府十分愤怒，在广州查获了数十箱鸦片，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①。由于科技方面远超中国，英国海军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清政府。1841年1月20日，战争

^① 战争爆发于1839年11月3日。

以《穿鼻草约》的签署而终结，条约规定清政府向英国政府割让香港，支付大量的赔款，承认中英官方政府的所谓“平等”谈判，并完全恢复贸易。此后，中国政府与英国军队又发生了几场战争，导致清政府遭受更大程度的打击，签订了更多条约。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给予英国更多的贸易特权，进行赔款，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以及割让香港更多的面积。显然，在这一系列接连发生的战争中，中国受到重创。在沙俄、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强制下，中国也被迫同意这些国家的贸易特许权。作为向中国强制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影响十分深远：它导致中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处于衰落与屈辱之中，直到今日，中国人对此依然愤愤不平。正是因为这些事件，一些组织和个体纷纷涌现，提出了一些关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主张。许多人在探索能使清政府由弱变强的方法，借以遏制外国的控制和霸权；另一些人则希望能够团结全民族对抗外国侵略者；也有一些人希望能用崭新的现代政治机制完全取代即将腐朽的满清政权。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不同的对抗性政治理念导致了中国内部更多的混乱与纷争。1949年，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①，中国开始由共产党执政。

这个区域的其他国家并不像中国那样遭受如此剧烈的动荡，然而尽管如此，这些国家也处于混乱之中，因为他们一直在为摆脱殖民统治、实现自由和独立而斗争。1937年至1945年，日本入侵其近邻国家，给这个地区造成了深刻而长

^① 于1912年成立，目的是给予新的共和国适合的宪法和议会政治机构。它最杰出的领袖是蒋介石。

远的痛苦、灾难和混乱。

在同一时期，许多东南亚国家或是欧洲的殖民地，或是处于欧洲人的支配之下。马来半岛（现在的马来西亚西部）、新加坡、缅甸以及婆罗洲（现在的沙巴、沙捞越和文莱）的部分均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成为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支那（现在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均在法国的统治之下。印度尼西亚群岛（例如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的很大部分被荷兰占领和管辖。剩下的一些岛屿（例如葡属帝汶）则成为了葡萄牙人的殖民地。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50年代，上述这些国家大多数才获得独立。

中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特征莫过于中国老百姓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它们在不同的地方呈现出各式各样的特点。关于“中国宗教”的内涵难以界定，而如果说中国人并没有拥有一个“真正的宗教信仰”，又似乎对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和信念来说并不公平。由于受到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万物有灵论、佛教、儒教^①和道教^②等多种多样不同派别宗教的影

①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中国最早的为人熟知的教育家。他的思想被称为儒家思想（Confucianism是一个欧洲人造出来的术语），脱胎于周代早期（公元前1122—前256）的思想，并非形而上学或是宗教的沉思。孔子所提倡的理想的黄金时代必须遵循一种固定的方式——道。在社会中，老百姓必须顺从于他们当地正确的习俗，遵守所有传统礼仪。这种自律的哲学唯有通过教化与通过对正确的道德和伦理原则的坚持来实现。伴随着许许多多的曲解，后来，儒家思想逐渐演变成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对中国政府官僚政治、政治理念以及中国社会秩序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② 老子（公元前6世纪），道家的创始人，《道德经》的作者。这是一种为抗议社会罪恶而采取退回或者回归到大自然的哲学思想，有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叫“无为”，意思为“顺其自然”。道家对自然的沉思成就了早期中国的科学思维。后来，道家思想被佛教所影响转化为广为人知的

响，中国人的“宗教”可真是一个融合体与综合体。

佛教早在公元1世纪就被引入中国，然而直到公元3世纪才开始生根发芽。佛教在中国北方实现了第一次繁荣，到公元500年，大多数人开始信奉佛教，到公元7世纪（唐代，公元618—907），佛教成为中国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而其政治影响力仍然有限。罗津斯基（Witold Rodzinski, 1984）这样描述道：“佛教的兴起绝不意味着对立宗教的完全消失……道教和儒教的持续不断的存在和影响使得佛教难以获得完全支配的地位，因为这三种信仰的共存可能有助于中国宗教走上显著的非绝对和折中之路。”^①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的中国化达到如此程度，以致其失去了最初的形式。它在中国终于获得了成功，因为它能够同化来自于诸如道教和儒教的那些竞争性信条的观念。到19世纪，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对中国艺术和文学的影响十分巨大，尤其是在唐朝。

中国盛行的佛教形式是大乘佛教，该教派的信条不同于佛祖^②最初的伦理教义。它本身很像一个新兴宗教，且被赋予了丰富的宗教仪式，以及供奉着佛陀和众多菩萨^③的庙宇，同时它与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哲学相互渗透与补充。

宗教，从佛教那里借鉴了许多典礼和宗教行头。道教的庙宇也借鉴了佛教寺院。

① 参见维托尔德·罗津斯基《被围起来的王国：有关中国从公元前2000年至今的历史》（*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2000 BC to the Present*），伦敦：丰塔纳平装书1984年版，第81页。

② 即释迦牟尼，名为乔达摩·悉达多，神的信使之一，佛教创始人，大约出现于公元前560年，佛祖的意思为“觉悟真理者”。

③ 菩萨是信佛学佛之后发愿自度度人乃至舍己救人的人的统称。

公元1世纪，佛教被从事贸易并在该地区的港口城市停留的印度商人第一次引进到东南亚。一些早期的王国诸如三佛齐国^①把佛教采纳为国教。作为佛教的两个主要教派之一，圣上座部（小乘）佛教在公元6世纪被商人从锡兰（今斯里兰卡）传入，后来它被佛教的另一支教派大乘佛教所取代，这是一种形式上更为“民主”的宗教。小乘佛教是一种非神论的佛教学派，它注重佛祖向人类传授的“生活方式”，并且有隐修的传统。然而，大乘佛教则不是一味地遵从佛祖的道，而是强调每一个虔诚的信奉者都有潜能去获得佛果。

印度教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和佛教一样，这个宗教被印度商人引入东南亚，在印度文化对东南亚的发展历史作出的贡献方面，同样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印度教很容易地被诸如印度尼西亚的满者伯夷王国^②、马打蓝王国^③和印度支那（柬埔寨）的高棉王国^④等地区的统治者所接受。这些王国按照印度教的理念和做法，大力构建自己的政府运作方式和宫廷礼仪，在宗教上模仿印度教的教义。马打蓝王国则随后接受了大乘佛教，因为其更加进步，并建造了许多宏伟的佛教纪念碑，比如著名的婆罗浮屠佛塔。因此，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印度教的影响之下，或者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印度教徒为其统治者。在这个地区（泰国、缅甸和印度支那），

① 三佛齐国，早期苏门答腊岛沿海的王国，7—13世纪在东南亚贸易和中印贸易中具有主导地位。

② 满者伯夷王国，建立于爪哇岛的早期的印度尼西亚王国（13—16世纪）。

③ 马打蓝王国，建立于爪哇岛中心的早期的印度尼西亚王国。国王比较出名的有萨伦德拉。

④ 高棉王国，9—12世纪的柬埔寨王国。

许多当地文化今天依然明显地有着主导性的印度教的影响。比如，各式各样的舞蹈和木偶显示出他们是基于史诗《罗摩衍那》^①而出现的。

16世纪，随着葡萄牙殖民者和耶稣会士等群体的到来，基督教首次出现在中国。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7—1610）成为第一个抵达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徒。耶稣会传教士最基本的目标是使中国人改变宗教信仰成为基督教徒。然而，与佛教的情况完全不同，基督教并没有获得大多数群众的认同。试图改变中国人信仰的早期基督教徒失败的因素很多，比如遭受清王朝统治期间的迫害，天主教传教士内部之间残酷的斗争，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其伪教徒和在东亚的欧洲殖民者的行为给基督教信仰带来的坏名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对中国的控制使得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两派的传教士可以毫无阻拦地在整个中国传播他们的信仰。然而，由于其侵略行径以及对于中国传统习俗的傲慢和骨子里的蔑视，他们与当地百姓和清政府之间都产生了无数的冲突。这些反基督教与仇外情绪纠缠在一起，随着后来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不断剥削和种种不公，两种态度最终被进一步激化。最著名的排外事件是1899年发生在北平（今北京）的义和团运动。

16世纪，基督教同样被欧洲殖民者（基本上以葡萄牙人为主）和耶稣会传教士^②传入东南亚。西班牙人则给菲律宾岛屿带来了天主教。当抵达当地的时候，他们发现，尽管一些

① 《罗摩衍那》，印度教的叙事诗。

② 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著名的葡萄牙传教士，1545年抵达马六甲。随后去香料群岛，直到1552年逝世。

印度教的影响已经从爪哇岛向当地渗透，但大部分居民仍然是万物有灵论者^①。在南部，伊斯兰教早已牢牢扎根。向马六甲^②（今属西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婆罗洲（今马来西亚东部、文莱和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西里伯斯岛（今苏拉威西岛）、新几内亚（今伊里安查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帝汶岛和其他印度尼西亚群岛传播基督教则得力于葡萄牙人。然而，他们试图牢固建立起基督教地位的努力却收效甚微，因为那个时期伊斯兰教已经被当地人广泛接受。欧洲殖民者时不时地使用暴力，企图使当地人改宗他们的宗教，他们在当地传播基督教的尝试导致与当地穆斯林国家经常性的敌对。荷兰人则给荷兰的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今印度尼西亚）带来了基督新教，并经常与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发生冲突。和中国的情况一样，欧洲殖民者与传教士之间的敌意与竞争，并没有让当地人对基督教产生好感，这也是基督教在这个地区无法获得牢固地位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伊斯兰教被认为比基督教更为现代和进步，无论是当地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更能接受。而同一时期，法国人则致力于将天主教传播到印度支那^③地区。

伊斯兰教主要是由阿拉伯商人在唐朝时期引入中国的，除了西部边疆地区，其对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相反，伊

① 信奉大自然的灵性。

② 1402年，该城市由拜里米苏刺国王建立，一个被流放的山帝王朝的印度王子，娶了满者伯夷帝国的公主为妻。拜里米苏刺后改信伊斯兰教。1424年逝世。据史料记载，在马六甲权力和声名的鼎盛时期，涵盖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波斯人的人民大众，曾生活在那里。

③ 18世纪中叶，据报导，在交趾支那或越南有大约三十万罗马天主教教徒。

斯兰教在东南亚却拥有绝对的影响力。7世纪时，阿拉伯商人和水手们第一次将这信仰带到该地区的港口城市，但是并没有使它得以牢牢巩固下来。直到15世纪，伊斯兰教才在该地区得以巩固并在该地区广泛传播。来自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裔穆斯林商人将伊斯兰教传入苏门答腊岛的北部，后来从这里将其传播到马六甲。15世纪末期，许多爪哇岛港口城市的统治者已经转而皈依伊斯兰教。18世纪，泰国南部、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大部分地区，除了巴厘岛以外，已经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紧接着，伊斯兰教取代印度教作为满者伯夷帝国的国教，然而此举受到了荷兰殖民统治者的大肆阻挠，穆斯林因为其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19世纪末期荷属东印度的伊斯兰教的复兴，在极大程度上为20世纪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一面是超自然理念。沃尔夫（A.P. Wolf, 1974）在他主要于香港和台湾的考察学习和研究中特别提到了三个主要类别的灵异存在：神、鬼和祖宗。^①他们以两两配对的形式进行交叉相对的归类：神与鬼、祖宗形成对比；鬼与神、祖宗形成对比；祖宗与神、鬼形成对比。比如，供奉神的食物是未煮过的（或是完整的）食物，而供奉鬼和祖先的食物则是煮熟的。神被认为是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中超自然的存在，他们居住在寺庙里，由神圣的将军守卫着。他们会对反对社会而犯罪的人实施惩处，然而他们也很容易被收买（譬如供奉食物）。他们写下报告、保持纪录，并与不同的行政区域保持着联系与交流。

^① 参见沃尔夫·A.P.编的《中国社会的宗教及其仪式》（*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鬼则是一种不祥、危险而怪异的超自然存在，他们被供奉于寺庙的外面和家庭的后门口。他们被认为是险恶的，有时是恶毒的。人们认为，给这些鬼供奉的食物和衣物被视为施舍或酬劳，如同人民对待强盗、乞丐和恶棍那样。祖先是一个家族血统中资格较老的成员，享受现世物质和精神上的好处。他们拥有被祈求、被崇拜和用膳食供奉的资格。

从有记载的最远古时代开始，中国人一贯有祖先崇拜的习俗。商朝（公元前1776—前1122）人用刻了文字的骨头作为神谕，这是中国人祖先崇拜所实施的形式（贝克，H.D. Baker, 1979）^①。中国人的祖先崇拜是一种互惠形式：祖先借其后代而存在，换言之，祖先们的灵性福祉取决于其后代在祭坛上的敬拜和供奉，而后代则有赖于其祖先的精神保佑和指引。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已经演变成大众祭祀、迷信活动和普遍行为，尤其盛行于海外的华人中。19世纪，大规模的移民从中国^②迁入东南亚，新抵达的移民中，许多人定居于城市或靠近该地区的商业中心，其结果是，使得当时中国的各种佛教教义和宗教信仰传入东道主国家，同时，中国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同样受东道主国家的影响，并相互融合。比如用马来人的名字命名所崇拜的神，相信那位神居住在一棵树上、一块岩石里。

中国和印度的移民，其崇拜场所的建筑风格有明显的不同，也有异于当地居民的宗教场所。举个例子，人们可以轻

① 参见贝克·H.D.《中国家庭及其亲属关系》（*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也有一部分移民来自于印度（主要是来自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

而易举地将中国寺庙、印度寺庙和舶来的欧洲基督教堂的建筑风格同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当地的马来人清真寺加以区分。

这正是早期的巴哈伊抵达当地宣传巴哈伊信仰之时所面临的多姿多彩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环境。

时至今日，中国正快速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对全球商业和经济举足轻重。中国人民已不再如19世纪那样受到外国势力控制。他们可站起来有能力对国内、亚洲区甚至全世界作出贡献。

它在短短数十年便实现了巴哈伊圣作的预言，成为未来的国家。但正如18世纪至现在无数学者及社会和政治思想家所说，中国亦需要灵性方面的激励才能继续迈向未来。

二、中国，中国，到中国去

“中国！中国！中国！到中国去！巴哈欧拉的圣道一定要传到中国。去中国传导的圣洁巴哈伊在哪里？中国具有最大的潜能。中国人的心灵最纯朴，最爱追求真理。向中国人传导，自己先要具备他们的精神，学习他们的经书，了解他们的习俗，从他们的角度、用他们的语言跟他们交谈。传导者必须时刻惦记中国人的精神福祉，不得有任何私念。在中国，一个人可以传导很多人，可以培养出具有神圣品格的杰出人士，而他们可以成为照亮人类世界的明灯。我真切地说，中国人不爱任何形式的欺诈和伪善，他们为崇高理想所激励。可惜身体状况不允许，不然我会亲自去中国……”^①

20世纪初，当阿博都-巴哈还在被监禁和流放时，他就热切盼望着能到中国传播巴哈欧拉的事业。祂大声疾呼：“噢！对此必须坚信！我想我可以去喀什，这是中国的一个省，也是迄今任何巴哈伊导师都未曾到过的地方。我打算只身一人，不带任何行李——只需装着一些书简、书籍和纸笔的手提包即可。我甚至已经获得了自己的护照：老穆夫提是

^① 参见《西方之星》卷十三，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

我的担保人。”阿博都-巴哈的夙愿被狡猾的、来自阿卡城^①的穆夫提^②易卜拉欣帕夏^③所制止。他派秘书给阿博都-巴哈带去口信说：“我听说阁下一直在考虑进行长途旅行。我不会如此失礼而粗鲁地去阻挠你的计划，也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你离开。但是，作为本省总督，我对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对中央政府负有责任。因此，一旦你踏上轮船，我就将发一封有关你离开的电报，这是我的公干。”^④

从穆夫提这封信中，阿博都-巴哈领会到祂并不被允许离开阿卡城去中国，接着阿博都-巴哈继续说道：“中国是未来的国家，我希望适合的教师能受鼓舞而到那广大的国家，建立上帝王国的基础，促进神圣文明的本质，并高举巴哈欧拉圣道的旗帜去邀请人们参加上帝的圣宴……”^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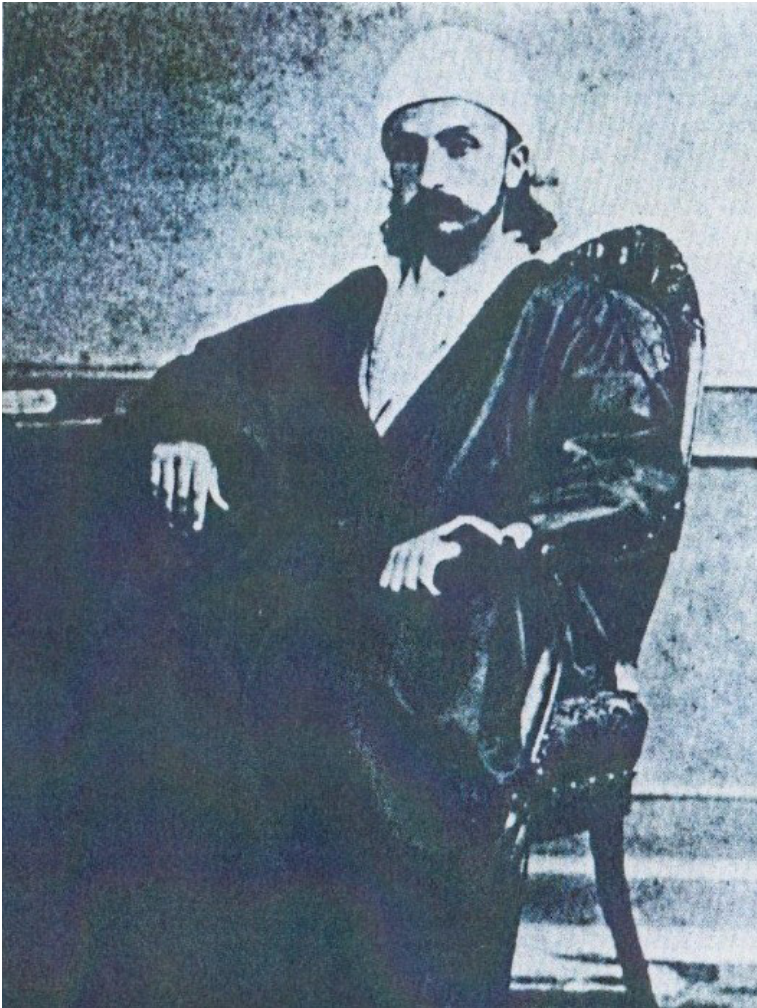
① 港口城市古城阿卡，是19世纪土耳其帝国的监狱城市，1868年，巴哈欧拉与祂的家人和同伴抵达巴勒斯坦（今以色列）的阿卡城。巴哈欧拉将其命名为“至大监狱”。

② 穆夫提，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咨询教规的律法师。

③ 帕夏，土耳其的高级政府官员。

④ 参见《西方之星》卷十三，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

⑤ 参见《西方之星》卷十三，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



阿博都-巴哈于阿德里安堡



阿卡（至大监狱）

三 早期的传导者

两位早期的巴哈伊信徒对亚洲地区的巴哈伊传导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中一位是贾迈勒·埃芬迪（Jamál Effendi）^①，他又被称为印度的征服者，对巴哈伊信仰在印度与缅甸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贾迈勒·埃芬迪在印度次大陆和其他与中国接壤的地区奔波，广泛传导巴哈伊教义。在圣地拜访过巴哈欧拉之后，在巴哈欧拉的指引下，贾迈勒·埃芬迪回到了印度次大陆，游历至更远的地方，继续他的传导工作。1888年，在阿卡流放的信徒哈吉·法拉朱拉-塔夫雷希（Haji Faraju'llah-i Tafrishi）的陪同下，他长途跋涉，来到东方，访问了柬埔寨、爪哇^②、暹罗（今泰国）和新加坡^③等许多国家。他们还游历到遥远的亚洲北部地区，访问了克什米尔、西藏（今西藏自治区）、莎车（今中国的莎车县）和中国突厥斯坦的苦盏（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接着又去了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和巴尔赫地区。虽然还没有资料表明这些地区有当地人信仰巴哈伊，但是毫无疑问，印度与缅甸有许多

① 参见H.M.巴柳齐（H.M.Balyuzi）《巴哈欧拉时代杰出的巴哈伊》（*Eminent Bahá'ís in the Time of Bahá'u'lláh*），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128页。

② 爪哇，原先是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一部分。

③ 1819年，由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建立。



贾迈勒·埃芬迪与印度次大陆的一位身份不明男孩的合影

人已成为巴哈伊。

另一位在推动巴哈伊信仰在亚洲的传播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巴哈欧拉的忠实信徒是赛义德^①·穆斯塔法·鲁米（Siyyid Mustafa Rumi）^②，他是贾迈勒·埃芬迪的一位杰出伙伴，通过贾迈勒·埃芬迪1875年在马德拉斯皈依巴哈伊信仰。1878年，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来到缅甸并定居仰光。他一直居留在缅甸，在此建立了巴哈伊社团并传播圣道。1945年，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在缅甸去世。他死后被圣护守基·阿芬第追认为“圣辅”^③。赛义德·穆

① 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

② 1899年，他与其他巴哈伊前往圣地，带着由曼德勒的巴哈伊为巴孛遗体所制作的大理石棺槨。他于1945年逝世，享年99岁。参见《巴哈伊世界》（*Bahá'í World*）卷十，第517—520页。

③ 圣辅的设立是出于保护巴哈伊信仰和传播巴哈伊信仰的目的，圣辅是由巴哈欧拉（后由守基·阿芬第）指派的个人。



赛义德·穆斯塔法·鲁米，缅甸巴哈伊社团的创建者

斯塔法·鲁米在缅甸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是把整个戴德诺（Daidanaw）村落的人都变成了巴哈伊信徒。正是缅甸的巴哈伊献出了大理石棺椁，用来安放巴哈欧拉的先驱——巴孛^①的圣洁遗体。

本书接下来将要展现的，是这两位圣道的伟大导师的精神追随者们如何进一步致力于在远东和东南亚国家弘扬巴哈伊信仰。

① 巴孛，原名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巴哈欧拉的先驱，巴比信仰的先知、创始人。1819年10月20日在伊朗的设拉子城出生，1844年5月23日，祂宣布自己是所有神圣经文所预言要来的上帝的双先知之一，1850年7月9日祂在伊朗的大不里士殉道。现在，祂的灵柩被安葬在以色列海法卡尔迈勒山的巴孛陵殿内。

四 最早到达中国的巴哈伊

有历史记载的首位到达中国的巴哈伊是巴孛的堂弟哈吉^①·米尔扎^②·穆罕默德-阿里^③（Haji Mirza Muhammad-‘Ali），他是哈吉·米尔扎·赛义德·穆罕默德（Haji Mirza Siyyid Muhammad）^④的长子。1862年至1868年，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⑤住在上海。从1870年起，作为商人，他开始定居香港，主要经营中国瓷器。他的顾客中有伊朗的显要人物，其中就包括纳赛尔丁沙阿。他在中国和香港所拥有的商埠经营范围包括茶叶、瓷器商品及黄金制品出口。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为巴哈欧拉的照片奉献了三个在中国制造的金银制相框。许多由巴哈欧拉写给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兄弟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侯赛因（Haji Mirza Muhammad Husayn）^⑥的信件表明：诸如

① 到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

② 放在名字前面意为“先生”，放在后面意为“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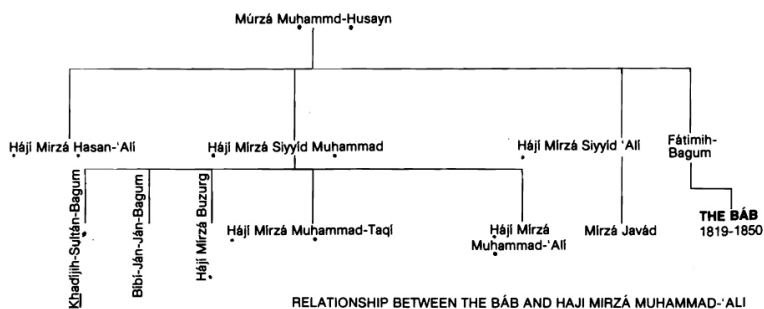
③ 参见H.M.巴柳齐《巴哈欧拉——荣耀之王》（*Bahá'u'lláh, The King of Glory*），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

④ 巴孛最年长的舅舅，为了回答他的问题，巴哈欧拉启示了《笃信经》。

⑤ 由巴哈伊世界中心研究部于1990年3月9日提供注释。

⑥ 又称哈吉·米尔扎·布祖尔格（Haji Mirza Buzurg），哈吉·米尔扎·赛义德·穆罕默德的第三个也是最小的孩子。在中国，他与既是生意伙伴也是兄弟的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一起创办了一家贸易公司。

茶盒、瓷器、茶叶、蜜饯、肉桂、花种、眼镜、特制书写纸和布料等商品，是通过两位阿夫南^①从中国运送出去而到达圣地^②的。1897年，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在返回设拉子的途中于孟买去世。那个年代，阿夫南的商埠遍布从香港到里海巴库的多个城市。1881年至1882年，巴孛的妻侄阿迦·米尔扎·易卜拉欣（Aqa Mirza Ibrahim）也来到香港定居。



巴孛与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关系图

① 阿夫南，巴孛的三个舅舅和巴孛妻子两个兄弟的后代。

② 这些商品当中的一些在以色列海法巴哈伊国际文物馆陈列，我们也可以在巴哈伊世界中心见到由守基·阿芬第购买的各式品种的中国家具和手工制品。

五 更多巴哈伊抵达中国

1902年，波斯巴哈伊阿迦·米尔扎·迈赫迪·拉什提（Aqa Mirza Mihdí Rashti）和阿迦·米尔扎·阿卜杜勒-巴基·亚兹迪（Aqa Mirza ‘Abdu’l-Baqi Yazdi）从阿什哈巴德^①抵达中国上海，成立了乌米德贸易公司——一家进出口企业^②的分支机构。守基·阿芬第一封日期为1919年6月7日的信件中说到阿迦·米尔扎·迈赫迪·拉什提是突厥斯坦和高加索地区前来参加朝圣的第一批人员之一。迈赫迪·拉什提这样描述道：“上海已经觉醒，中国人中已有巴哈伊信仰者，并在不断将启示之光照向他们的同胞。”玛莎·鲁特^③在1924年1月1号写给守基·阿芬第的信中提到：阿迦·米尔扎·迈赫迪·拉什提已经在上海去世。^④

1910年，两名美国巴哈伊查尔斯·M.里米（Charles M.

① 俄罗斯突厥斯坦的阿什哈巴德，曾有一个较大的巴哈伊社团，也是第一个巴哈伊灵曦堂的所在地。

② 由巴哈伊世界中心研究部于1990年3月9日提供注释。

③ 玛莎·鲁特（1872.8.10—1939.9.28）。守基·阿芬第说：“子孙后代会将她封为‘阿博都-巴哈在第一个巴哈伊世纪提升的圣辅之首’。”她于身后被守基·阿芬第封为上帝的圣辅。参见M.R.加里斯《玛莎·鲁特——神圣殿堂前的雄狮》，威尔梅特，伊利诺伊州：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页。

④ 同上。

Remey)^①和霍华德·C.施特吕芬(Howard C. Struven)游历上海,拜会了阿迦·米尔扎·阿卜杜勒-巴基·亚兹迪。他们可能是造访中国的第一批西方巴哈伊。在那个时期,在中国的巴哈伊社团仍然主要是那两名开设乌米德贸易分支机构的波斯信徒。

1914年^②,随着侯赛因·乌斯库利(Husayn Uskuli)^③和其他两名巴哈伊抵达上海,巴哈伊社团在中国更加稳固地



-
- ① 查尔斯·M.里米,上帝的圣辅,圣护去世后却变成圣约的破坏者(瓦解巴哈伊信仰圣约的人)。
- ② 9月,阿格尼丝·亚历山大(Agnes Alexander)第一次从法国去日本,10月在香港停驻。
- ③ 由于他出身乌斯库小镇,所以,他的名字“乌斯库”十有八九是波斯语的“Usku'i”。



上海的巴哈伊（约1930年3月或4月）。坐者从左到右分别为：乌斯库利先生较小的女儿之一鲁哈尼叶（Ruhania）或贾拉利叶（Jalalia）、乌斯库利先生的母亲莎拉（Sarah）、里兹万尼叶·苏莱曼尼（Ridvaniyyih Suleimani 乌斯库利先生之女，苏莱曼尼先生之妻）；站立者从左到右分别为：侯赛因·乌斯库利先生、乌斯库利先生较小的女儿鲁哈尼叶或贾拉利叶、米尔扎·侯赛因·图蒂（Mirza Hossein Touty）、苏莱曼·苏莱曼尼先生（Suleiman Suleimani）、古德雷特（Goudrat 乌斯库利先生之子）。



孙中山，中华民国的国父，
1924年玛莎·鲁特向他宣传了巴哈伊信仰

建立起来。后来，侯赛因·乌斯库利携全家来到上海^①。他于1875年出生于阿塞拜疆的乌斯库小镇，从声名赫赫的巴哈伊传导者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Haji Mirza Haydar-‘Ali）^②那里知晓了巴哈伊信仰。在阿博都-巴哈的有生之年，侯赛因·乌斯库利也有幸得以朝圣。婚后，侯赛因·乌斯库利偕妻子搬到阿什哈巴德，在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他们作为拓荒者去中国。乌斯库利在上海的家是巴哈伊主要聚会点，也为访客提供热情的接待。1931年，乌斯库利先生和夫人与他们的女儿、女婿苏莱曼尼（Suleimani）夫妇住在上海江西路451号。从当时在上海拍摄的照片可以得知，那时巴哈伊社团已经在上海^③建立，有若干中国人成为了巴哈伊。可能在1928年成立了上海的第一个地方灵理会^④，将乌斯库利家在上海江西路的住址列为巴哈伊信仰在中国的通信地址^⑤。同年，中国银行经理崔佩（Tswi Pei）的住处被列为香港的巴哈伊小组的通信地址^⑥。关于崔佩，我们缺乏更多的了解。

侯赛因·乌斯库利在中国的服务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他充当着中国巴哈伊与圣护守基·阿芬第之间的主要联络人。比如1925年，圣护发电报给侯赛因·乌斯库利先生，要求他代表中国的巴哈伊致电巴格达的英国外交机构高级公使，恳求他能够施以援手，在被巴哈伊信仰之敌所霸占的巴哈欧拉的房子的所有权问题上伸张正义。1935年，侯赛

①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三，第871—873页。

② 因《卡尔迈勒山的天使》出名，1920年在海法逝世。

③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三，第361页。

④ 当地选出的巴哈伊教务管理机构。

⑤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二，第182、185页。

⑥ 由巴哈伊世界中心研究部于1990年3月9日提供注释。

因· 乌斯库利因进出口生意去台湾购买茶叶。据悉，他是第一个访问那里的巴哈伊。尽管1937年至1945年战争期间他的生命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尽管随着新中国建立他的传导环境受制约，但是作为上海唯一所知的外国巴哈伊，乌斯库利先生仍然忠诚地坚守着他的拓荒岗位，尽管饱受极大的艰难困苦。圣护写信给他，表达了留在上海的重要性，然而圣护同样提醒他慎重开展传导工作，以免危及他的巴哈伊身份。许多西方的巴哈伊已经离开中国，他的许多中国联络人不再上门拜访，因为害怕被中国当局怀疑勾结外国人。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走向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的艰难转型调整期，通货膨胀严重肆虐，内战仍旧迫在眉睫，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遭到怀疑，中国政府排外态度一直持续了许多年。

1956年2月25日，乌斯库利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留下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江湾公墓。

六 早期的华人巴哈伊

据最早的记载显示，中国的首位华人巴哈伊是陈海安（在美国他称自己为哈罗德·A.陈^①），就读于芝加哥大学，1916年6月中旬离开芝加哥，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公法，1916年12月22日，陈海安从旧金山坐轮船回到出生地上海。1916年4月或5月初的一段时间，在齐亚·巴格达迪（Zia Bagdadi）^②先生的关爱和引导之下，他成为巴哈伊。在1916年10月20日写给埃拉·库珀^③夫人的一封信中，罗伊·威廉^④



齐亚·巴格达迪，将中国第一位巴哈伊陈海安带入巴哈伊信仰

① 由巴哈伊世界中心研究部于1990年3月9日提供注释。

② 齐亚·巴格达迪，1909年9月从波斯来到美国学习医学，伟大的巴哈伊传导者，于1937年逝世。参见《巴哈伊世界》卷七，第535—539页。

③ 埃拉·库珀，享有盛誉的美国巴哈伊信徒，是1898年12月10日第一批参访圣地的朝圣者之一。

④ 罗伊·威廉（1875.9.17—1951.12.20），效力于巴哈伊灵曦堂联合委员会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国家灵理会数年。玛莎·鲁特的亲密朋友。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二，第662—664页。

先生描述陈海安为“齐亚·巴格达迪的一个六月大的巴哈伊孩子”。从他成为巴哈伊开始，陈海安对于传扬他新发现的圣道显示出浓厚的热情，在一封1916年5月4日用芝加哥大学泛亚联盟的信笺写给欧内斯特·沃尔特斯（Ernest Walters）的信中，他说道：“我正在这所学校（芝加哥大学）的三千多名学生当中努力地传播着我新获得的福音。”在他离开旧金山回中国前夕，陈海安的激情再一次体现在1916年12月19日写给欧内斯特·沃尔特斯先生的另一封信中：“我将于12月22日乘船返回。请为我祈祷，上帝将指引我的工作。我将在上海与一个名叫巴希的波斯裔巴哈伊会晤，并将努力在上海建立中国巴哈伊灵理会。”同年，安东尼·司徒（Anthony Yuen Seto）先生^①和他的妻子玛米·洛蕾塔·奥康纳（Mamie Loretta O’Conner）^②在夏威夷正式接受巴哈伊信仰，司徒先生也成为夏威夷群岛的第一个华人巴哈伊，也是美籍华人中第一个巴哈伊。

1915年7月31日，世界著名的巴哈伊旅行传导者玛莎·鲁特从横滨乘船至夏威夷岛，途中她在满洲里做了短暂停留。^③这似乎是她第一次踏上中国。她的护照表明中国是她计划前往的国家之一。在这次的短暂停留中，东北没有留下她传导的记录，但是她后来三次访问中国，对该地区巴哈伊的发展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 安东尼·司徒（1890.11.18—1957.5.6），一名律师，被推选为第一届火奴鲁鲁灵理会主席。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三，第886—889页。

② 玛米·洛蕾塔·奥康纳（1885.4.10—1970.4.15），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五，第479—481页。

③ 参见M.R.加里斯《玛莎·鲁特——神圣殿堂前的雄狮》，威尔梅特，伊利诺伊州：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3年版，第58、70、71页。

1917年，十一个波斯籍巴哈伊在上海聚首。主要是在阿迦·米尔扎·艾哈迈德（Aqa Mirza Ahmad）和里达·大不里士（Rida Tabrizi）两人的努力下，一份巴哈伊小册子得以出版。这可能是第一份中文巴哈伊出版物，其中包括《巴哈伊十二条原则》，以及几段阿博都-巴哈解释欧战精神意义的文章，这些文章先前由一位朝鲜籍巴哈伊翻译成中文。这份印有阿博都-巴哈照片的小册子同时也以波斯语出版。一年之后，一份俄语版的巴哈伊信仰简释由阿迦·米尔扎·艾哈迈德和里达·大不里士在满洲（今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编纂后面世。

1919年，另一位来自大陆的中国人陈廷模（Chen Ting Mo）在美国接受了巴哈伊信仰。陈廷模对于他新找到的信仰同样抱有热情，他把许多巴哈伊书籍带回中国，并将其存放在上海的一个图书馆里。陈廷模曾经有幸收到过阿博都-巴哈给他写的一封书简，阿博都-巴哈在书简中激励他“巩固上海和北平（今北京）的灵理会，专注于弘扬圣道”。阿博都-巴哈还托付陈廷模给两位新入教的信仰者带去祂最诚挚的爱和善意，并说祂会为他们祈求上帝的指引，使他们能够拥抱上帝的福祉，成为两支闪耀的蜡烛，为中国投下天堂的光辉。关于那个时期北京巴哈伊社团的建立，似乎没有其他可以参考的资料。据推测，阿博都-巴哈所说的“两个新皈依巴哈伊信仰的灵魂”，一名是陈海安先生，另一名因无资料佐证，我们暂时无法确定。

七 玛莎·鲁特和中国早期的巴哈伊

1923年4月25日，玛莎·鲁特离开大阪来到华北。这是她第二次来中国，一直待到1924年3月，为期近一年。在北京，她住在由一位英国女医生开办的名为“平安坊”的招待所。玛莎·鲁特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巴哈伊工作，包括在百余所大学、学院和学校^①举行众多报告和演讲，举办公共聚会，向许多个人和重要人士宣扬巴哈伊信仰，等等，其中有一个人是当时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②的幕僚。玛莎在英文报纸《英文正报》（*English Standard*）和《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 of Peking*）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介绍巴哈伊信仰，其中一些文章是用中、英文双语出版的。她同样为很多中国学生辅导和教授英语，先后两次任教于燕京^③女子学院，在北京的一所世界语^④学校任助教。通过她，该校的学生开始

① 参见守基·阿芬第《神临记》，威尔梅特，伊利诺伊州：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0年版，第387页。

② 黎元洪，继承了袁世凯的位置，国民党的第一任总统。黎元洪担任总统的四年间，对于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他的执政，破坏了新的民主国家的建设时机，他的政权崩塌，主要也是由于军阀势力在全国各地不断扩展，1916年至1918年的军阀统治使中国进一步反抗外国压迫进而重获主权独立变得更为艰巨。

③ 北京的旧称，中国金代（公元1125—1234）的首都之一。

④ 许多早期巴哈伊信徒学习世界语（*Esperanto*），因为巴哈伊信徒倡导一种世界性的辅助语言。世界语是由柴门霍夫（Ludwik Lejzer Zamenhof）

同圣护守基·阿芬第有了一些书信往来。在北京的时候，玛莎同样尽力学习中文，以便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传导活动，然而她并没有足够的空余时间来掌握它。当时正在日本拜访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女士^①的艾达·芬奇（Ida Finch）夫人，加入了玛莎·鲁特在北京的工作。芬奇夫人一直留在中国，直到1923年8月19日离开中国前往东京。没过多久，芬奇夫人离开东京，乘船赴美国西雅图。

玛莎·鲁特在中国游历了许多地方，陪同者是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和她的非巴哈伊的妹妹玛丽。在9月1日的地震之后，玛莎的同伴于1923年10月12日从日本赶来加入她的工作，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1923年11月4日，他们在北京举办了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巴哈伊灵宴会。玛莎·鲁特和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在北京结识的中国权贵当中，有一位是鲍

医生创造的，他的女儿莉迪亚（Lidia）与玛莎·鲁特会见之后，成为一名巴哈伊教徒。1923年9月，世界上第一所世界语专门学校在北京开办，来自世界的170名学生入学。参见温迪·赫勒（Wendy Heller）《世界语创始人的女儿莉迪亚·柴门霍夫的生活》（*Lidia: The Life of Lidia Zamenhof, Daughter of Esperanto*），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5年版。

- ① 阿格尼丝·鲍德温·亚历山大，1875年7月21日出生于夏威夷，1900年11月26日，在巴黎接受巴哈伊信仰。回夏威夷后成为岛上第一个巴哈伊教徒。1913年10月13日，她收到了阿博都-巴哈鼓励她去日本游历的书简。1914年抵达日本，在那里旅居整整32年。她也是第一个在朝鲜传教的巴哈伊信徒。《神圣计划书简集》里提到过她。她访问过中国、朝鲜、台湾、香港、菲律宾、美国、加拿大和欧洲。1937年离开日本，1950年又回去。1957年3月27日被守基·阿芬第指派为圣辅。她也是东京召开的第一届东北亚巴哈伊国家灵理会的成员之一。1967年从日本回到夏威夷。1971年1月1日，在夏威夷逝世。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五，第423—430页。



玛莎·鲁特（前）与日本第一位巴哈伊福田先生（Fukuta左前），阿格尼丝·亚历山大站在后排。照片摄于约1915年。

先生^①，他是冯将军^②的幕僚。因为熟人的关系，他们能够在冯将军为军官子女所开办的军校中宣扬巴哈伊信仰。他们结识的另一位有影响力的中国人是P.W.陈先生，他通过阅读鲍先生在1920年从日本带回上海的巴哈伊著作而第一次获悉巴哈伊信仰。应鲍先生的要求，陈先生帮忙翻译了一些巴哈伊作品作为报刊文章发表。通过陈先生的倾力协助，玛莎·鲁特和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可以在北京的大型集会中发表演讲，并见到邓宸铭先生。邓宸铭被巴哈伊信仰所吸引，后来成为一名巴哈伊。他还表达了要在北京创办巴哈伊学院的渴望——在玛莎·鲁特离开中国之前，他是有能力办到的——

① 早前在日本曾经与阿格尼丝·亚历山大会面过。

② 最有可能是著名的基督教徒冯玉祥将军（1882—1948），孙中山民族主义纲领的支持者。



玛莎·鲁特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发表的宣扬巴哈伊信仰的报纸文章

这所学校除了日常的课程之外，每天都会提供世界语讲座。

1923年11月25日，在邓宸铭的陪同下，玛莎·鲁特、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和她的妹妹玛丽离开北京前往中国华北地区游历，参观了包括天津、济南（她们在那里的山东基督教学院发表过演讲）、孔夫子的出生地曲阜和徐州。紧接着，他们乘坐火车去上海，途经坐落于长江沿岸的南京和苏州。到达上海以后，阿格尼丝和玛丽于1923年12月27日乘船启程至夏威夷的火奴鲁鲁，玛莎·鲁特则在上海待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她对一些社团作了演讲，其中包括儒学会、神智学会和世界语协会。她又抓住机会为《上海时报》（*Shanghai Times*）等报刊写了一些关于巴哈伊的文章，并深入内陆，到武昌和杭州宣讲巴哈伊教义。1924年3月27日，玛莎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在1924年4月到达香港后，她开始了繁忙的传导活动，拜访当地报纸的编辑、大学校长、图书馆藏家，进行大量的演讲，会见了许多知名人士。《香港电讯》（*Hong Kong Telegraph*）发表了一篇关于玛莎·鲁特和巴哈伊信仰的社论，因为她在港期间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在香港大学作了演讲，并在那里为正在中国访问的印度著名诗人、教育家、人文学家泰戈尔^①讲解了巴哈伊教义。玛莎·鲁特再次回到中国大陆，在广州逗留并把握时机进行多次演讲。返回香港后，她沿着海岸而下，经历了四天的水路行程，到达越南的首都西贡，在那停留了七天。玛莎还简短访问了柬埔寨

① 泰戈尔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奖。1924年，应中国学者徐志摩、梁启超和张君勱的邀请访问中国，在当地社团的赞助下，作了一场关于新知识的演讲。

（法属印度支那^①）。在印度支那，她又一次成功地在当地的中文和越南报纸上发表了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并在一个学校里进行了演讲，这所学校的学生有着与众不同的宗教背景。玛莎·鲁特于1924年5月底回到香港，并在此后乘船前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玛莎·鲁特在报纸上发表的关于巴哈伊的文章给巴哈伊教在中国和香港的传播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远至菲律宾，因为这些中文报纸在当地亦有销售。

玛莎·鲁特于6月底7月初到达澳大利亚墨尔本，然后乘火车到珀斯与克拉拉（Clara）及海德·邓恩（Hyde Dunn）^②会合。她在那里的图书馆举行题为“中国之伟大复兴”的演讲时，认识了一批来听她演讲的当地华人。她在新西兰奥克兰的艺术社团的大演讲厅里做了同样的演讲。在新西兰，她还为位于奥克兰和惠灵顿的中国爱国者俱乐部做演讲。

在玛莎·鲁特第二次访问中国期间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当属清华大学^③校长曹云祥博士接受巴哈伊信仰。阿格尼丝·亚历山大说，玛莎·鲁特勇敢地在没有经过通常引荐的情况下前往清华大学，然而却受到了曹博士和曹夫人的热情接见^④。曹博士1911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也曾在哈佛大学求学。他的瑞典裔妻子埃琳·路易丝·霍林（Elin Louise Halling）^⑤是美国公民，也在同一时期成为巴哈伊。在清华大

① 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② 海德·邓恩，是对巴哈伊信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的确立起到非常重要帮助的圣辅。参见《巴哈伊世界》卷九，第593—596页。

③ 因美国庚子赔款而创立的“留美预备学校”。

④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七，第548页。

⑤ 他们在伦敦相识并结婚。在伦敦，曹博士为政府工作。

学执教八年后，他们搬到上海，并与那里的波斯籍巴哈伊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930年，玛莎·鲁特在广州再次会见了曹博士^①。会谈中，曹博士根据当时的混乱形势，论述了巴哈伊信仰对于动荡中的中国的实用性，谈及巴哈欧拉出现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孔子曾教谕过：五百年有圣人出。

随后，曹博士将许多巴哈伊著作和小册子译成中文，其中包括1931年翻译的约翰·埃比尼泽·埃斯尔蒙特（John Ebenezer Esslemont）博士^②的著作《巴哈欧拉与新纪元》（*Bahá'u'lláh and the New Era*）。该书序言由曹博士的晚辈钟



1937年7月1日，玛莎·鲁特在上海。后来上海被轰炸，她于8月底被迫离开上海。

①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四，第432页。

② 约翰·埃比尼泽·埃斯尔蒙特博士于身后被守基·阿芬第封为“圣辅”，1925年在圣地逝世。



约翰·埃比尼泽·埃斯尔蒙特，曹博士翻译成
中文的《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的作者

可托^①所作，他不仅赞同巴哈伊信仰中阐明的原则，而且他在序言中还陈述道：“认各人之努力，进而为全世界之感化，得全世界之和平，人类幸福前途。”^②。还未来得及为巴哈伊信仰作出更多贡献，1937年2月8日曹博士在回家的路上惨遭车祸，于上海逝世。1938年，曹夫人搬去北京居住。在英年早逝的三年前，曹博士完成了《已答之问》^③的大部分中文

① 高度地赞美巴哈伊信仰和曹博士。

②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四，第420—428页。

③ 1904年至1906年，劳拉·克利福德·巴尼几次到阿卡城访问期间，对阿

翻译。曹博士的朋友唐（T.Y. Tang）先生负责《已答之问》译稿的校对工作，他在曹博士去世之后不久也去世了。1937年，由于曹博士手稿的第39—44章节已经丢失，孙颐庆先生不得不补译。1939年11月12日，《已答之问》译著最终在上海出版^①。

1923年，乌斯库利先生^②的女儿和女婿：里兹万尼叶^③和阿里-穆罕默德·苏莱曼尼^④，作为拓荒者^⑤抵达上海。和乌斯库利一道，他们全家为巴哈伊信仰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由于中国时局艰难，他们在1950年8月离开上海，返回伊朗。随后，他们又作为拓荒者去了台湾，1954年10月22日到达基隆，成为第一批定居于当地的外国巴哈伊。他们到达该地时，那里已经有了十名本地的巴哈伊。两年后，他们成立了台南第一个地方灵理会。

1926年，另一位中国人支（Zhi）先生通过艾达·芬奇夫人的传教，接受了巴哈伊信仰。当时艾达·芬奇夫人从日本前来拜访玛莎·鲁特，并协助她开展传导工作。支先生在中

博都-巴哈的提问的辑录。

① 这一系列巴哈伊中文出版物可以从《巴哈伊世界》卷六，第549页；卷八，第738页；卷十，第615页中获得。

② 那时，侯赛因·乌斯库利一家包括他的母亲莎拉·哈努姆，他的大女儿里兹万尼叶·苏莱曼尼夫人，他的女婿苏莱曼·苏莱曼尼先生（苏莱曼·阿里-穆罕默德·苏莱曼尼·米拉尼），他的两个小女儿鲁哈尼叶和贾拉利叶、他的儿子古德雷特。1934年，鲁哈尼叶、贾拉利叶和古德雷特赴贝鲁特美国大学学习，三人与奶奶莎拉·哈努姆一道离开了上海。

③ 里兹万尼叶，是辅助团成员和台湾总灵理会成员，1981年3月18日在台湾逝世。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八，第738—740页。

④ 苏莱曼·阿里-穆罕默德·苏莱曼尼·米拉尼，1988年在台湾去世。

⑤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八，第752页。

国出版了一本称为“*Magazine*”^①的小册子，但是关于他的巴哈伊活动我们所知不多。1933年，侯赛因·乌斯库利报道称支先生的兄弟也成了一名巴哈伊。

1930年，玛莎·鲁特第三次来到中国，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当时她途经香港，并在广州停留了一周。在那里，她通过广州的无线电台进行了一场广播演说，并在中山大学和多所中学发表演说。1930年9月23日，她在《广州市政日报》两页版特别增刊中发表了她的三篇电台演说的翻译文章：

《国际新教育》、《世界语运动》和《什么是巴海运动》，这份增刊也刊登了阿博都-巴哈的照片。在香港，玛莎·鲁特主要致力于写作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较少进行演讲，在短短的逗留期间里她发表了三十篇文章。她还拜会了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先生。廖崇真和她的姐妹廖奉恩（Foulk I.W.）夫人担任玛莎的翻译员（具体细节参见后面章节）。在她的文章《中国文化和巴哈伊主义》^②中，玛莎·鲁特把陈将军描述为眼光远大且深思熟虑的人。据报道，陈铭枢对她说：“前两天你送我那本小册子之前，我对巴哈伊运动所知不多。读了这本小册子之后，我认为巴哈欧拉是个预言家，现在的中国正需要这样一位预言家。至少这种教义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伤害，而至多则可以让中国和其他每一个国家都获益匪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适合接受这些教义，因为中华文明的基础便是世界和平。当前我们正处于严重的兵荒马乱的境地，可是当中国恢复和平，我们与其他

① 当时中国，对于学者来说，出版杂志、期刊等是很平常之事。

② 巴哈伊主义是巴哈伊信仰的旧译名。参见《西方之星》卷二十一，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267页。

国家地位平等之后，中国将会在所有的国际事务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随后玛莎·鲁特从广州来到上海。在9月下旬，阿格尼丝·亚历山大从日本赶来，再一次加入到她的工作中，协助她开展传导工作。当阿格尼丝·亚历山大抵达时，乌斯库利先生和他的两个女儿，还有苏莱曼尼先生和米尔扎·侯赛因·图蒂^①先生以及曹博士和曹夫人都在上海。玛莎和阿格尼丝在皇家亚洲协会进行了三场演讲。玛莎也写了许多文章向当地各种报纸供稿，她们用了连续八天的时间刊登关于巴哈伊信仰的文章。玛莎和阿格尼丝花了十天的时间，一起在上海传播巴哈伊信仰。在苏莱曼尼先生的陪同下，玛莎访问南京，并持续七天。1930年10月6日在南京，她在国立中央大学对以男性为主的听众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时代的国际教育》的演讲，在场为数不多的女性听众在听到巴哈伊教中关于男女平等的教义时颇为兴奋^②。玛莎·鲁特还在金陵女子大学发表演讲，并认识了若干政府官员。其后，玛莎·鲁特返回上海，向1930年10月7日即将乘船回东京的阿格尼丝告别。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日益激烈的斗争导致广播电台的关闭，玛莎在上海和南京的行程中，并没有机会发表无线电演讲。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的上海有十个巴哈伊，他们是曹博士和曹夫人，米尔扎·侯赛因·图蒂和侯赛因·乌斯库利先生和他的家人，每两周都会在乌斯库利的家中举行巴哈伊聚会。曹博士自告奋勇将《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翻译成中文，玛莎·鲁特为这个项目提供首笔捐赠，并且许诺为翻译工作募集更多的补充资金。1930年10月22日，她从上海乘

① 即侯赛因·图蒂。

② 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女性开始注重女性的选举权，追求男女平等。

船出发，10月27日到达日本。她在那里待了两个月时间，然后回到夏威夷。据报道，在那个时期许多中国学者成为巴哈伊，有些广州的巴哈伊将玛莎的一些演说稿翻译成中文，并将它们分发给媒体。

到1934年，上海灵理会已经稳固建立起来。在当年5月的一份通函中，唐先生称那次集会总共有八个人参加，曹夫人被推举为财务主管，唐先生被推选为秘书和图书馆馆长。

1937年3月22日，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再次拜访了中国的巴哈伊。她从日本乘船前往圣地^①，途径上海停留途中，她花了一天半的时间与苏莱曼尼一家、乌斯库利先生和图蒂先生相聚。

1937年6月，玛莎·鲁特从日本抵达中国，这是她最后一次访问中国^②。在上海，玛莎住在外国居民区，也就是公共租界区^③。由于中日交战，她在中国的行程十分短暂。尽管生命攸关，她还是与老朋友们重叙友情，安排了船只将中、英文的巴哈伊书籍运至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并拜访了她先前来访时结识的杰出人士。1937年8月14日，由于上海正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轰炸，玛莎不得不撤离。租界区受到轰炸，许多人在接连发生的混乱中丧命，然而，当一个装有巴哈欧拉头发的盒子从玛莎的手袋中掉落，她相信她定将安全抵达，因为她回想起巴哈欧拉在《笃信经》里的文字：“头上的一根头发，比天堂和人间的任何东西都要珍贵得多。”^④乌斯库利先

① 巴勒斯坦，今以色列。

② 她也是直到二战末期访问日本的最后一名巴哈伊教徒。

③ 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区和法国租界区是在当地外国人的直接管辖之下，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强加给清政府的一个条件。

④ 作者援引自加里斯的《玛莎·鲁特——神圣殿堂前的雄狮》第446页（威

生把她带到码头，通过一艘摆渡船，她很快登上“杰斐逊总统号”轮船。她于1937年8月20日到达马尼拉。

1920年至1940年间，同样有许多巴哈伊传导者访问中国，其中包括米尔扎·侯赛因·图蒂、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内（Hippolyte Dreyfus-Barney）先生^①、基思·兰塞姆-凯勒（Keith Ransom-Kehler）夫人^②、F. 圣乔治·斯彭德洛夫（F. St George Spendlove）先生^③、马克·托比（Mark Tobey）先生^④、西格弗里德·斯普夫洛赫尔（Siegfried Shopflocher）先生^⑤和艾达·芬奇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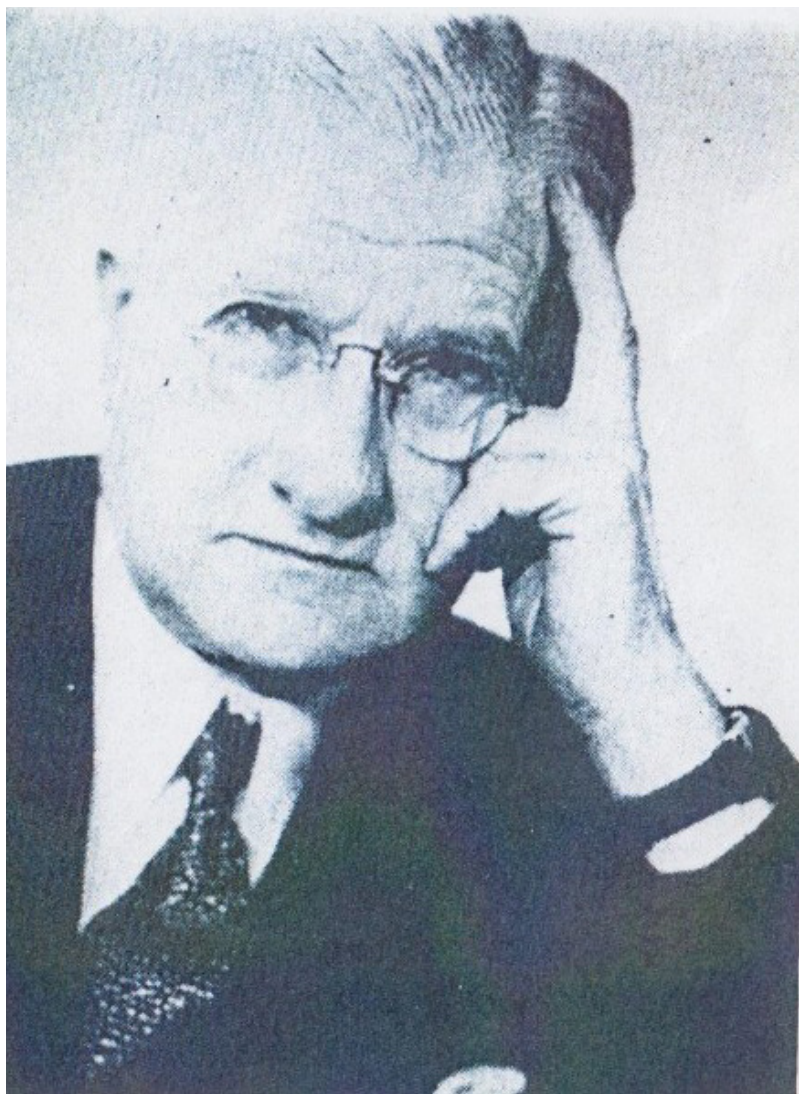
米尔扎·侯赛因·图蒂，一个波斯的巴哈伊，1919年1月抵达上海，后来在1921年移居至菲律宾。1927年他返回上

尔梅特：巴哈伊出版社1983年版）。这句话的实际出处应为1923年霍勒斯·霍利（Horace Holley）编辑的《巴哈伊经文：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语粹》（*Selections from the Utterances of Bahá'u'lláh and 'Abdu'l-Bahá*）。——中文编辑注

- ① 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内，法国的第一个巴哈伊教徒，由梅·博尔斯·麦克斯韦尔于1901年将他引荐加入，也是访问伊朗的第一个欧洲巴哈伊教徒。他游遍整个加拿大和美国，远至日本，于1929年逝世。
- ② 基思·兰塞姆-凯勒，1933年10月23日因天花在伊斯法罕逝世。1933年10月30日被守基·阿芬第追封为“圣辅”。参见《巴哈伊世界》卷五，第389—400页。
- ③ F.圣乔治·斯彭德洛夫，一位中国艺术的专家，自学中文。于1962年逝世。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三，第895页。
- ④ 马克·托比，著名的巴哈伊艺术家，得到许多国际奖项和荣誉。通过朱丽叶·汤普森了解巴哈伊信仰，1918年成为巴哈伊教徒，1976年4月26日逝世。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七，第401—404页。
- ⑤ 西格弗里德·斯普夫洛赫尔，访问东方的巴哈伊教徒，负责北美威尔米特灵曦堂的建造，被圣护称为“灵曦堂的主要建造者”。1952年2月29日被守基·阿芬第指派为圣辅，经历一段时间的疾病后，1953年7月27日在蒙特利尔逝世。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二，第664—666页。



大约1931年10月在中国上海的巴哈伊。坐者（从左到右）：里兹万尼叶·苏莱曼尼夫人、曹夫人（埃琳·路易丝·霍林，曹博士之妻）、莎拉（乌斯库利先生之母）、乌斯库利先生的一个小女儿，可能是鲁哈尼叶或者贾拉利叶、乌斯库里先生的另一个小女儿，可能是鲁哈尼叶或者贾拉利叶。站者（从左到右）：苏莱曼·苏莱曼尼先生、米尔扎·侯赛因·图蒂先生、曹博士、侯赛因·乌斯库利先生、古德雷特（乌斯库里先生之子）



西格弗里德·斯普夫洛赫尔，20世纪20年代访问过中国



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内先生，1920年至1922年间访问中国



基思·兰塞姆-凯勒，美国第一位巴哈伊殉道者，1931年访问中国

海，在那里居住到1946年。1932年，他前往东京拜访阿格尼丝·亚历山大^①。

1920年至1922年间，伊波利特·德雷富斯-巴内在中国待了一年半。

1931年6月25日至1931年8月初，基思·兰塞姆-凯勒在东京访问了阿格尼丝·亚历山大。1931年8月12日，在回澳大利亚的途中，她同样对上海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在上海时，

^① 他可能是第一个访问日本的巴哈伊。

她通过电台宣传巴哈伊信仰，发表公开演说，与杰出的教育家和官员们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应廖奉灵小姐^①（廖崇真的妹妹）的邀请，她访问了广州，成为廖崇真的客人。她在中国、日本和印度游历了两年，之后在1932年8月，她代表美国巴哈伊，为了一项特别的使命前往波斯，恳求沙阿当局允许巴哈伊文献进入波斯。



F.圣乔治·斯彭德洛夫，一位加拿大的巴哈伊，1932年结束朝圣之旅后访问了上海，在游历了南京和北京之后去了日本。1934年，马克·托比在伯纳德·利奇（Bernard Leach）^②的陪同下到上海拜访了他们的朋友、一位年轻的中国艺术家滕奎（Teng Kuei）。当他们在华盛顿大学学习的时候，马克向滕奎学习过中国书法的技巧和哲学，滕奎所传授

① 廖奉灵，获得了密歇根州大学的硕士学位，担任广州岭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② 伯纳德·利奇，一个通过马克获知巴哈伊教义的英国人，在那个时候，他暂时还不是巴哈伊教徒。



著名巴哈伊陶艺家伯纳德·利奇，1934年与马克·托比一起访问中国



著名巴哈伊画家马克·托比，1934年与伯纳德·利奇一起访问中国

的理念和风格影响了马克·托比以后多年的绘画创作。在上海期间，马克曾于1934年5月11日在银行家俱乐部讲巴哈伊的历史。他与曹博士为上海的巴哈伊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租了两间房子用作巴哈伊图书馆，1937年，图书馆关闭。随后马克·托比和伯纳德·利奇一起访问日本。

到20世纪40年代，许多生活在国内的中国人已经闻知巴哈伊信仰，其中一些人成为了巴哈伊。1976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巴哈伊国际会议中，笔者曾与一位中国的长者交谈，他说早在30年代他就在上海听说了巴哈伊信仰。

八 最后的岁月

1920年至1940年间，中国派遣了许多学者赴海外留学。他们为了中国的发展，在“庚子赔款奖学金”的支持下去获取新的知识技能^①。他们中的许多人应邀参加形式多样的巴哈伊活动，一些人随后成为巴哈伊。阿博都-巴哈曾提到一位在华盛顿参加和平大会的中国学生，在参加一场巴哈伊会议时，他带着浓厚的兴趣问了许多问题，会议结束时他说：“这是我听说过的最好的宗教！”另一位来自新中国（指中华民国）领袖家庭的中国学生，在抱以巨大的热情阅读了巴哈伊的文献之后，他感慨道：“这正是新中国所需要的。”^②

廖崇真^③先生是在海外成为巴哈伊的中国学者之一，他与罗伊·威廉在美国一起研究巴哈伊信仰。1921年，作为一名康奈尔大学的在校生，他第一次听说了巴哈伊信仰。据基斯·兰塞姆-凯勒所说，廖崇真也曾参加过杰纳比·法泽勒（Jenabe Fazel）^④的讲座。那一年，他接受了巴哈伊信仰。

①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被派往日本。

② 参见《西方之星》卷十三，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4年版，第185—186页。

③ 曾任广东省建设厅蚕丝改良局局长。

④ 米尔扎·阿萨杜拉·法迪勒，杰出的巴哈伊传导者和学者，阿博都-巴哈派他去欧洲和美国深化当地对巴哈伊的认识。后来被守基·阿芬第派到



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在海法

1923年春天^①，他回到故乡广州，帮助玛莎结识了许多中国高级官员。1924年，他安排玛莎拜会被视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②，并在会晤中担任她的翻译。孙中山先生听得兴趣盎然，让玛莎送给他两本巴哈伊的著作。曹云祥博士在他的《大同教之在中国》一文中提到，孙中山听闻过巴哈伊信仰，阅读过有关巴哈伊的书籍，并声称这与中国社会的需求息息相关。在玛莎访问期间，廖先生的姐妹廖奉恩成为巴

美国传讲信仰。

① 在那时期，一个中国学生（H.C. Waung），应阿格尼丝·亚历山大的请求，将印有巴哈伊教义小册子《9》翻译成了中文，这本小册子随后在中国出版并被分发了出去。

②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四，第431页。



中国境内杰出的巴哈伊廖崇真，时任
广东省建设厅蚕丝改良局局长

哈伊，并担任她的翻译。同年，另一位中国人张先生（T.J. Chwang）在欧洲成为巴哈伊之后返回上海。

廖先生曾将一些巴哈伊文献翻译成中文。1937年，他向守基·阿芬第报告：经过五年的悉心工作，他完成了《巴哈欧拉书简集》的翻译工作。他翻译的另一部著作是《隐言经》。他还曾经将他翻译的《十二基本原则》和圣护所写的巴哈伊简史编成小册子并印刷两千多份，分发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图书馆。尽管广州正经历战争，受到日本人的狂轰滥炸，他还是在1938年6月17日再次写信给圣护，说道：“在



早期的中国巴哈伊信徒，可能是廖崇真和家人

枪林弹雨中，我已经完成了两本重要的巴哈伊著作，即《巴哈欧拉书简集》和《已答之问》的翻译。现在我正要开始翻译第三本，即《阿博都-巴哈论神圣哲学》。因为我坚信世界新秩序和最终解放依赖于巴哈欧拉之原则的实现，我愿意尽绵薄之力将这福音带给我们的人民。”1939年，廖先生完成了《巴哈欧拉祈祷默思录》的翻译。

1939年至1945年的战争期间，尽管通讯非常困难，来往于圣护和中国大陆巴哈伊之间的信件却并未中断。在这一时期，一些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成为了巴哈伊，来自南京的楚耀良（Chu Yao-Lung）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46年4月在华盛顿成为巴哈伊。1946年7月他回到中国，在上海拜会了侯赛因·乌斯库利先生、苏莱曼尼夫妇、伯尼斯·伍德（Bernice Wood）女士^①和吉米·周谢山（Jimmy Chou Chia-san）先生^②。1945年8月17日，楚耀良在上海成婚，在之后的8月21日，他和妻子来到南京定居，在这里的政府部门任职。他向许多朋友传授巴哈伊信仰，并成功引导他的邻居袁先生（H.C.Yuan）加入巴哈伊。

1945年至1949年，许多中国空军军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进行训练，在与当地巴哈伊的一番接触并参加了各种形式的聚会之后，他们成为了巴哈伊。这些中国求知者经常拜访住在丹佛郊外惠特拉齐的伊丽莎白·克拉克（Elizabeth Clark）夫人和她的孩子们，并在那里展开关于巴哈伊的非正式讨论。在这些接受巴哈伊的军官中有戴维·栾池（David Luan chi）先生、陈天利（Chan Tien-Lee）先生、吉米·周谢山先生和袁（M.S. Yuan）先生^③。

1949年，楚耀良先生、陈天利先生、袁（M.S. Yuan）先

① 伯尼斯·伍德，曾于1946年在中国上海与美国援助康复机构工作。她报道说：大量中国人对巴哈伊信仰感兴趣，并在上海举行了巴哈伊会议。她还报告称：巴哈伊文献分发给杭州、南京和汉口的求知者。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一，第372页。1990年8月10日，她离开香港去美国西雅图。

② 于1947年在夏威夷结婚并定居。

③ 1947年，在朋友把他引荐给玛丽亚姆·汉尼夫人之后，他随即成为一名巴哈伊信徒。



1945年7月，一组中国飞行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威勇牧场（Temerity Ranch），与其他朋友一起参加巴哈伊国际学校的聚会。

生和另一个袁（H.G. Yuan）先生迁居台湾^①，分布在台北或台南，他们可能是最早定居于台湾的巴哈伊。

另一位在美国成为巴哈伊的杰出中国人是颜雅清^②。1905年11月29日，她出生于上海，父母（颜福庆和曹秀英）都是家境富有和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她的家庭信仰基督教。16岁时，她作为大学文化交流学生，获得了赴美国史密斯学院留学的奖学金，成为该校获得此奖最年轻的中国人。毕业之后，她回到上海。1923年，她通过表叔曹云祥博士第一次获悉巴哈伊信仰。离婚之后，她曾以中国大使馆女主人的身份，在莫斯科的中国使馆为她的伯父颜惠庆（时任中国

① 台湾在1895年至1945年间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

②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五，第476页。



颜雅清女士，曹云祥博士的表侄女

驻俄国大使）工作。随后她迁至柏林和瑞士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东北爆发战争，她赴美国居住。1941年至1943年，由于她的父亲在蒋介石内阁担任卫生部长，她回到重庆（战时的中国首都）为战争贡献力量。1944年她返回美国，并于1945年在伊利诺伊州的威尔梅特成为巴哈伊。同年，她为联合国公共信息部效力。

在美国时，她代表巴哈伊参加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许多大型的公开集会，包括巴哈伊或非巴哈伊的集会，并经常在演说中引用守基·阿芬第的话。1949年4月4日至9日^①，在萨克塞斯湖畔，作为四个主要组织者之一，她主持了联合国组织的第三

①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二，第601—603页。

届国际非政府组织会议。1952年，她再次作为巴哈伊代表团的成员，参加10月6日至10日在纽约美国总部举行的非政府组织的第五次国际会议，并且担任会议第一工作委员会副主席^①。1970年3月18日，颜雅清与世长辞。颜雅清交往多年的老朋友米尔德丽德·莫塔赫德（Mildred Mottahedeh）^②写道：在中国未来的巴哈伊发展史上，将会有颜雅清的永恒地位。^③



1949年4月4日至9日，颜雅清（左三）作为巴哈伊代表团成员参加在纽约举办的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国际会议。从左到右：阿明·巴纳尼（Amin Banani）、米尔德丽德·莫塔赫德、颜雅清、马修·布洛克（Matthew Bullock）。

①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二，第609—610页。

② 米尔德丽德·莫塔赫德，在1949年于纽约举办的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国际会议中，她也是巴哈伊代表团的成员。

③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四，第431页。

九 新纪元的开始

1949年至今，巴哈伊信仰在中国大陆发展缓慢，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宗教自由受限、否定上帝存在的政策以及对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日益增长的怀疑态度。从那时起，在中国大陆就没有进行过活跃的巴哈伊传导活动。虽然在中国的进展暂时停滞，巴哈伊在东南亚和远东其他国家的发展却呈现出勃勃生机。这意义非凡的历史性时期发生在守基·阿芬第发起十年传导和巩固计划——即广为人知的“十年远征计划”（1953—1963）^①——实施之前到完成的这段时间里。世界各地的拓荒者为了巴哈欧拉的事业，坚定不移地去开拓众多未开发的领域，他们许多人后来被授予巴哈欧拉的勇士^②称号。正因为这些早期教徒的献身精神，世界许多国家开始接纳巴哈伊信仰。

① “十年远征计划”是由守基·阿芬第发起，1953年开始，1963年4月在里兹万结束。它的结束时间，正是“巴哈欧拉宣示”一百周年之际。

② 这个头衔最初由守基·阿芬第授予在“十年远征计划”的头几年中为巴哈伊教开拓新的领域的人们。后来也授予第一批到达那些尚无巴哈伊信徒的地域的人们。

十 东南亚

在“十年远征计划”之前抵达东南亚的众多早期拓荒者之中，就有K.M.福斯达（K.M. Fozdar）医生^①和希琳·福斯达（Shirin Fozdar）夫人^②。1950年，他们把巴哈伊信仰带到新加坡和马来亚（当时被称为海峡殖民地）。这些国家在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书简集》^③中有所提及。到达新加坡后，为了向当地人展示巴哈伊信仰为人类服务的教义，他们开办了一所免费的学校，教授三百多名贫困妇女读书写字。在头两年里，由于当地人接触巴哈伊后反响并不强烈，他们时常感到疲劳和沮丧。然而不久之后，当地人渐渐地接受了巴哈伊信仰，当新加坡第一个地方灵理会成立时，传导环境大为改

① K.M.福斯达医生是1925年时在印度接受巴哈伊信仰的第一批印度帕西人之一。1953年，他去安达曼岛拓荒，在那里，他成功地使四个人坚定地加入巴哈伊信仰。从圣护那里，获得巴哈欧拉的勇士头衔。由于当局拒绝他继续停留，他在安达曼岛只停留了四个月，便回到新加坡。1958年，K.M.福斯达医生在新加坡逝世，埋葬于蔡厝港的巴哈伊公墓。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三，第892页。

② 希琳·福斯达出生于一个巴哈伊家庭，在新加坡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1992年在新加坡逝世。

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博都-巴哈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教徒发出了十四篇书简，号召他们向五大洲扩大巴哈伊事业，在这批书简中大约共有一百二十个国家被提及。



约1938年在拉贾斯坦邦阿杰梅尔市，K.M.福斯达夫妇与玛莎·鲁特（中）

观^①。K.M.福斯达医生、希琳·福斯达夫人、约翰·福斯达^②医生、张玉龙（隆）^③先生和G.戴特瓦尼（G. Datwani）先生^④都是新加坡第一个地方灵理会创始成员。

新加坡第一位巴哈伊是纳拉因达斯先生（Naraindas），

①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二，第573页。

② 约翰·福斯达医生因开拓了文莱地区被圣护守基·阿芬第授予巴哈欧拉的勇士头衔。他曾经是亚洲洲级顾问团成员，福斯达夫人曾是辅助团成员和马来西亚总灵理会成员，他们居住在马来西亚东部的古晋市。约翰·福斯达博士是K.M.福斯达医生夫妇的次子。

③ 张玉龙（隆），于1986年逝世。

④ G.戴特瓦尼，1952年在新加坡接受巴哈伊信仰，后来与妻子拉赫米（Lachmi，1953年在日本接受巴哈伊信仰）于1954年8月4日开始定居香港，2013年在香港逝世。

第一次公开演说可能是在扶轮社发表的^①。

陈清红女士^②是新加坡最早接受巴哈伊信仰的中国人之一（1958年2月）^③。她于1904年在新加坡出生，在一个富裕而传统的华人家庭成长。她在新加坡一流中学之一的卫理公会女子中学就读，毕业后和报业家、工业家李乔治（George Lee）成婚。依据当时习俗，她采用了丈夫的姓氏。

她在新加坡上流社会甚为活跃，47岁时（1951年），她在一个由新加坡卫理公会主教夫人（H.B. Amstutz）主办的聚会中偶然认识了希琳·福斯达夫人。她对宗教素有兴趣，曾长期参加圣经班，她亦读过《古兰经》和《法句经》，时常参加宗教和哲学讨论。福斯达夫人正召集新加坡知名妇女来推动新加坡妇女协会的成立，李夫人立刻自荐为妇女运动出力，从此两人展开了这一紧密和没有间断的友谊。

七年后李夫人在她丈夫和八名成年子女反对下公开成为了巴哈伊信徒。当时刚好是1958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巴哈伊洲际大会。李夫人得以在会中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交流。与会180名代表接受了她的邀请，在她的住宅欢度志月灵宴会，她深感荣幸。

从此，她便不断和她相识的人讨论巴哈伊。她收藏了很多巴哈伊书籍，在与人交谈时总是将话题引向巴哈伊理想。她中英文同样流利，可以向任何有兴趣人士分享她的信仰，包括她在1953年在如切福利中心创办的新加坡女子会的会

① 依据约翰·福斯达私人通讯。

② 于1999年在新加坡逝世。关于陈清红女士的资料，可进一步参见Phyllis Ghim Lian Chew博士2009年为新加坡总灵理会所写的文稿*MRS GEORGE LEE (nee Madam Tan, Cheng Hong)*。

③ 依据约翰·福斯达私人通讯。

员。希琳·福斯达夫人曾说：“她对宗教充满热忱，不管是否生病，她都能将话题从庸俗转向灵性。”当年新加坡地方灵理会秘书王露丝太太（Mrs Rose Ong，后来担任亚洲洲级顾问）说：“她经常欢迎有兴趣学习巴哈伊的人到她家里讨论。”她对巴哈伊信仰认识很深而她最快乐的时刻便是与他人分享。

李夫人最令人难忘的是她热情款待了多位知名巴哈伊，包括拉赫马图拉·穆哈吉尔（Rahmatu'llah Muhajir）医生、法伊齐先生（A.Q. Faizi）、科利斯·费瑟斯通（Collis Featherstone）先生和塔拉祖拉·萨曼达里（Tarazullah Samandari）先生等多位圣辅。在1961和1964年，“阿玛图-巴哈”鲁希叶·哈努姆^①（‘Amatu'l-Bahá Rúhiyyih Khánum）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地区传导时，李夫人帮助安排行程并亲自陪同。

1961年福斯达夫人离开新加坡至泰国东北益梭通府办学校，李夫人的贡献愈加重要。当时新加坡是归属于东南亚总灵理会（1957—1965）管理。总灵理会成员多次到新加坡时都是由她接待。1964年马来西亚总灵理会成立，她在1964年至1966年充当这新成立的总灵理会成员。

她在六十年代后期和马来西亚信徒袁其良先生、梁达墀先生（Leong Tat Chee）和切理·孙臣（Chellie Sundram）医生紧密合作巩固新加坡巴哈伊团体，努力增加新加坡信徒人数，他们的合作成功地建立了两个新地方灵理会。他们亦筹划了东南亚巴哈伊青年大会和1971年1月的大洋洲巴哈伊大

① 出生名为玛丽·萨瑟兰·马克斯韦尔（Mary Sutherland Maxwell），守基·阿芬第的妻子，1952年被指派为圣辅。

会。信徒人数的增加推动新加坡总灵理会在1972年成立，李夫人被选为首届灵理会成员。在她担任成员期间，新加坡宪报登载了巴哈伊圣日，总灵理会登记为法人，巴哈伊婚姻得到政府承认。李夫人在负责争取这些权利的委员会里充当重要角色。

最早闻知巴哈伊信仰的新加坡人或许是一个女学生，她于1930年在香港大学举办的巴哈伊讲座中听过玛莎的演说。她被巴哈伊的教义深深地折服了，以至于第二天她去见玛莎，并问到：“我要做些什么，才能推进巴哈伊运动在我的家乡新加坡的发展？”^①然而，关于这位学生的身份资料已经无迹可寻。

抵达这些地区的其他拓荒者还包括从伊朗来的拉赫马图拉·穆哈吉尔^②和他的妻子^③。拉赫马图拉·穆哈吉尔医生出生于1923年，他的姓源自于阿博都-巴哈的一封信简，其中有这样的问候：“啊，穆哈吉尔——噢！拓荒者！”1954年，他们作为拓荒者去了印度尼西亚的明打威群岛，因此实现了圣护的愿望。在那时，明打威群岛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巴哈伊总灵理会的目标。1954年2月，在“十年远征计划”之初，拉赫马图拉·穆哈吉尔医生和伊朗·穆哈吉尔夫人抵达了麻拉西贝鲁。他们被分配到明打威群岛，在那里，穆哈吉尔医生作为内科医生在印尼的卫生部门任职。他们的献身精神及对当地信仰者锲而不舍的鼓励 and 爱护很快就收获了成果，许多当地百姓成为巴哈伊，多个灵理会得以建立。1958年，当

①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四，第432页。

②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八，第652—659页。

③ 伊朗·穆哈吉尔，圣辅阿里-阿克巴尔·福鲁坦（‘Ali-Akbar Furutan）先生的女儿。



圣辅拉赫马图拉·穆哈吉尔医生



约1969年3月，在马来西亚槟榔市，圣辅拉赫马图拉·穆哈吉尔医生在乔治镇的堡宅大街42号的槟榔巴哈伊中心为中国教徒做演说。

穆哈吉尔夫妇离开明打威群岛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展了四千多个巴哈伊，成立了三十三三个地方灵理会和一所巴哈伊学校。他们还购买了巴哈伊捐助地，并将一本巴哈伊小册子翻译成明打威当地的语言。穆哈吉尔医生被称为巴哈伊大规模传导之父，尤其是在菲律宾、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1957年10月，他是守基·阿芬第任命的最后一批圣辅之一^①。1979年10月，穆哈吉尔医生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去世。

“十年远征计划”中来到印度尼西亚^②的其他拓荒者包

① 守基·阿芬第先后在1951年12月、1952年2月和1957年10月任命了三批圣辅，一些圣辅在1952年3月和1957年3月之间被单独任命，还有一些圣辅是于身后被封。

② 在那时期，还有其他作为拓荒者来到印度尼西亚的家庭，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提及。

括：凯霍斯劳·佩曼（Keykhosrow Payman）先生和夫人帕法涅·佩曼（Parvaneh Payman）^①、马努切赫尔（Manutschehr）医生和夫人玛丽赫·加布里埃尔（Malihe Gabriel）^②、阿弗拉图恩·佩曼（Aflatoon Payman）先生和夫人塔列赫·佩曼（Talieh Payman）^③、法祖拉（Fazullah）医生和夫人拉米亚·阿斯塔妮（Lamia Astani）^④，以及努尔丁（Nooruddin）医生和夫人巴赫尔·苏拉娅（Bahereh Soraya）^⑤。胡达拉姆·佩曼（Khudarahm Payman）先生和夫人帕尔文·佩曼（Parvin Payman）^⑥是第一批到达印度尼西亚的拓荒者，1951年抵达印尼，在那里待了六年。

据1955年4月13日伊朗·穆哈吉尔夫人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巴哈伊总灵理会亚洲传导委员会的信中记载，大约在1955年三四月间，恩乔·孙天（Njo Suntian）先生成为最早在印尼信仰巴哈伊教的中国人。穆哈吉尔夫人经常给委员会写信汇报明打威群岛的巴哈伊活动情况，因为该岛屿是澳

-
- ① 于1952年抵达印度尼西亚，1964年他们搬到澳大利亚墨尔本。目前作为拓荒者在库克群岛传教。
 - ② 于1955年6月4日抵达印度尼西亚，1962年4月搬到澳大利亚墨尔本，是本书作者的岳父母。马努切赫尔医生2003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逝世，玛丽赫·加布里埃尔夫人现居于澳大利亚珀斯。
 - ③ 于1956年抵达印度尼西亚，1966年4月搬至澳大利亚墨尔本。
 - ④ 于1954年抵达印度尼西亚，法祖拉医生在2003年1月2日在印尼逝世，拉米亚·阿斯塔妮夫人现仍居住在印尼武吉丁宜。
 - ⑤ 1954年抵达印度尼西亚，努尔丁·苏拉娅医生在1995年10月15日在印尼博佐内戈罗逝世。巴赫尔·苏拉娅夫人在2008年5月14日在印尼博佐内戈罗逝世。
 - ⑥ 胡达拉姆·佩曼先生是亚洲巴哈伊洲级顾问团前任成员，他于2002年在印尼逝世。他的妻子帕尔文·佩曼夫人现仍住在雅加达。胡达拉姆·佩曼、阿弗拉图恩·佩曼和凯霍斯劳·佩曼是三兄弟。

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灵理会的传导目标。孙天先生在印尼明打威群岛的麻拉西贝鲁成为巴哈伊。该委员会秘书在1957年7月13日写给东南亚巴哈伊国家灵理会秘书信中记载，两位中国年轻人，王清吉（Wong Ching Gea，18岁）先生和唐伟（Tamway，15岁）先生，均于1956年8月18日接受了巴哈伊信仰。他们加入巴哈伊信仰的时间可能更早，因为据史料记载，孙天先生宣示入教的日期是1955年12月12日，这与穆哈吉尔夫人信中提到的1955年4月13日是相矛盾的。目前并没有更新的关于孙天先生及两位中国年轻人的资料。另一位早期在印尼接受巴哈伊信仰的中国人是陈莉娜女士^①，她后来迁居至新加坡，并担任1972年成立的首届新加坡巴哈伊国家灵理会的成员。

哈里·克拉克（Harry Clarke）先生^②、查尔斯·邓肯（Charles Duncan）先生^③、约翰医生和夫人格蕾塔·福斯达（Greta Fozdar）、米诺（Minoo）先生和夫人玛乔丽·福斯达（Majorie Fozdar）^④作为拓荒者去了文莱。贾姆希德·福斯达（Jamshed Fozdar）先生^⑤作为拓荒者去了越南。希斯马图拉·阿齐兹（Hismatullah Azizi）先生^⑥作为拓荒者到中国大陆和澳门。1953年，乌代·纳拉因·辛格（Udai Narain Singh）

① 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珀斯。

② 于1954年抵达文莱，被圣护授予开拓文莱的巴哈欧拉的勇士。

③ 被圣护授予开拓文莱的巴哈欧拉的勇士。1954年作为拓荒者来到文莱，随后去了澳门，现居冲绳。

④ 米诺·福斯达先生是辅助团成员，是K.M.福斯达医生和希琳·福斯达最小的儿子，米诺·福斯达先生和夫人现居澳大利亚西部的杰拉尔顿。

⑤ K.M.福斯达医生和希琳·福斯达夫人的大儿子。他和他的妻子现居新加坡。

⑥ 于1954年3月8日抵达香港，1985年离开香港赴加拿大。

先生^①作为拓荒者来到锡金，1956年去了西藏。1957年，珍妮·弗兰克尔（Jeanne Frankel）^②和她的母亲玛格丽特·贝茨（Margaret Bates）夫人^③作为拓荒者来到尼科巴群岛^④，在哥打基纳巴卢和沙巴住了三个月^⑤，之后返回美国。抵达这些地区的其他拓荒者还有许多。

马来西亚巴哈伊信仰的进一步推动，有着袁其良先生^⑥的不懈努力和高瞻远瞩，尤其在这些地区的华人中间。世界正义院将他描述为马来西亚第一个受启蒙的巴哈伊^⑦。在1949年于印度召开的泛太平洋和平会议上，袁其良先生第一次听说了巴哈伊信仰。1953年12月19日^⑧，他成为马来亚联邦（西马来西亚^⑨）的第一个巴哈伊，时年五十四岁。在那个时候，英国殖民地古晋和沙捞越（今东马来西亚的一部分）都有巴哈伊^⑩，他们是斯蒂芬·黄、吉米·沈、陈德基、C.K.徐先生和

-
- ① 被圣护授予开拓锡金和西藏的巴哈欧拉的勇士。（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三，第455页。）
 - ② 被授予开拓尼科巴群岛的巴哈欧拉的勇士。（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三，第454页。）
 - ③ 被授予开拓尼科巴群岛的巴哈欧拉的勇士。（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三，第454页。）
 - ④ 位于安达曼海，苏门答腊岛的北部。
 - ⑤ 依据约翰·福斯达私人通讯。
 - ⑥ 关于他的早期生活的描述可见亨利《袁其良叔叔》，美国加利福尼亚：Ong出版社1979年版。亨利是袁其良的孙子。
 - ⑦ 参见1986年11月23日约翰·福斯达医生致《新加坡十九日灵宴会通讯》。
 - ⑧ 参见《新加坡十九日灵宴会通讯》，1986年8月1日。
 - ⑨ 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宣布成立，将马来亚、沙捞越和英属北部婆罗州（沙巴）合并。
 - ⑩ 依据约翰·福斯达私人通讯。



袁其良先生（中）与第一批在缅甸接受巴哈伊信仰的两位中国人

夫人，以及1953年成立的第一次古晋地方灵理会的成员们^①。1899年11月19日，袁其良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是一名锡矿工人的儿子。他曾信奉天主教，是一名药剂师，同时也为当地多家报纸画漫画。他向在马来西亚芙蓉市的神智学的朋友传播巴哈伊信仰，其中有一些人成为了巴哈伊。1954年4月21日，芙蓉市巴哈伊第一届地方灵理会成立。对于马来西亚以及周边国家的许多巴哈伊来说，他是“精神教父”，当地的信徒深情地称他为袁其良叔叔。他四处游历，推动巴哈伊事业，积极地对当地华人进行传导，结果在缅甸^②和菲律宾^③产生了第一批华人信徒。1964年，他入选马来西亚巴哈伊首届国家灵理会，并被推选为大会秘书。1968年，他被指派为

①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二，第573页。

②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五，第253页。

③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五，第253页。



梁达墀，一位在马来西亚的早期华人信徒

东南亚洲级顾问^①。在为巴哈伊信仰积极贡献了32年之后，袁其良叔叔于1986年6月17日在马来西亚怡保逝世，享年86岁。在给马来西亚巴哈伊社团的唁电中，世界正义院说道：袁其良“激励了他忠诚的追随者，为伟大的华族朋友在世界上建立神圣文明作出了表率。”^②

另一名对这些地区巴哈伊信仰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信徒是来自中国的梁达墀先生^③。1955年，他在马来西亚马六甲通过K.M.福斯达医生和夫人知晓了巴哈伊信仰并成为巴哈伊。在接受巴哈伊信仰之前，梁达墀是当地五个主要宗教

① 洲级巴哈伊教务管理机构，负责巴哈伊信仰的保护和宣传工作，于1968年6月成立。

② 参见《新加坡十九日灵宴会通讯》，1986年8月1日。

③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五，第527页。



（约在）1965年9月，世界正义院成员胡什曼德·法特希阿扎姆先生（Hushmand Fatheazam）（站立者），向马来西亚太平市（Taiping）一大群华人信徒和寻道者演讲。左首坐者为梁达辉先生，右首坐者为巴哈伊教太平地方灵理会主席兼秘书长。



1952年，新加坡巴哈伊第一届灵理会。站者（从左到右）：杜明华先生、基辛尚德先生（Kishinchand）、约翰·福斯达医生、莫提拉姆先生（Motiram）；坐者（从左到右）：张玉龙（隆）先生、G.戴特瓦尼先生、希琳·福斯达夫人、K.M.福斯达先生、拉姆齐先生（Ramsay）。



1953年，古晋、沙撈越和西马来西亚的第一届巴哈伊灵理会



1956年香港维多利亚巴哈伊第一届灵理会。站者（从左到右）：安东尼·司徒先生、G.戴特瓦尼先生、保罗·什叶先生（Paul Shia）、希斯马图拉·阿齐兹先生（Hismatullah Azizi）；坐者（从左到右）：陈柳勋先生、玛米·洛蕾塔·司徒夫人、玛丽·什叶夫人（Mary Shia）、陈柳宝先生。



1957年文莱的文莱小镇第一届巴哈伊灵理会，坐者（从左到右）：史艾克·穆罕默德先生（Shaik Muhammad）、谢德兴先生（Cheah Teck Heng）、米诺·福斯达医生、江修韵夫人、齐欧克先生（Cheok文莱的第一个巴哈伊）、陈殷生先生；站者（从左到右）：罗伯特·齐欧克先生（Robert Cheok）、芮提拉·特瑞博胡仁先生（Ratilah Tribhuran）、锡亚先生（Sia）。



1958年台湾台北第一个巴哈伊灵理会



1959年4月，柬埔寨金边第一个巴哈伊灵理会

（道教、儒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联合会的委员。1955年成立的马来西亚马六甲第一届地方灵理会中，他被推举为主席。他向马来西亚巴哈伊国家灵理会捐出自己的房舍，它之后成为马六甲的巴哈伊中心。他还有幸代表华人出席1963年在伦敦举行的巴哈伊世界大会^①。1964年，梁达墀被推举为马来西亚巴哈伊第一届国家灵理会的成员，同年，他被指派为辅助团^②的成员。1965年，在袁其良的陪伴之下，他来到香港、澳门和台湾开展了传导之旅，同时，他也积极启发马来西亚信徒认识到对中国人传导和中国的觉醒对未来巴哈伊信仰的重大意义。

① 巴哈欧拉在巴格达宣示的百年纪念。

② 最初成立于1954年的巴哈伊教务管理机构，最初，它的职责定位于协助圣辅的工作。洲级顾问团履职之后，巴哈伊教务管理机构在洲级顾问团的指导下工作。

十一 港澳台等地区

1953年10月20日，
作为一名拓荒者，弗
兰西斯·赫勒（Francis
Heller）夫人^①从美国来到
澳门，直待到1954年11月
4日才返回故乡。她是已
知的第一位在澳门居留
的巴哈伊。1953年12月
8日，卡尔·谢勒（Carl
Scherer）^②和他的妻子洛
蕾塔（Loretta）从美国来
到澳门定居，直到1959年
1月6日才离开。三位早期
的拓荒者都因为在当地的
贡献获得了巴哈欧拉勇士



卡尔·A（左）和洛蕾塔·L.谢勒，在
澳门的巴哈欧的勇士

头衔。严沛峰先生^③是第一位居住在澳门的华人巴哈伊，他于

① 弗兰西斯·赫勒夫人，于1990年逝世。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三，第449页；卷十八，第738—740页。

② 1931—1936年期间，卡尔·谢勒就职于德克萨斯石油公司，全家在中国居住。

③ 严沛峰现仍居住于澳门。



1955年6月14日澳门的巴哈伊的合影。坐者（从左到右）：曼纽尔·费雷拉（Manuel Ferreira）、玛丽·董（P.什叶夫人）、洛蕾塔·谢勒、高保罗（年轻男孩路易斯·什叶）；站者（从左到右）：保罗·什叶、约翰·蒋修宰（John Z.T. Chang）、卡尔·谢勒、哈里·严（Harry Yim）、威廉·杨（William Yang）。

1954年7月15日接受巴哈伊信仰。澳门第一届灵理会于1958年成立，然而直到1989年澳门巴哈伊第一届总灵理会才得以成立，圣辅“阿玛图-巴哈”鲁希叶·哈努姆代表世界正义院亲临会议。

抵达并居住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巴哈伊还有1954年8月4日抵达香港的吉安·戴特瓦尼夫妇。同年秋天，作为“十年远征计划”的拓荒者，安东尼·司徒先生和夫人从旧金山抵达

香港。由于司徒夫人时任联合国协会的社交秘书，司徒夫妇有足够的机会向在香港居住的杰出的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宣传巴哈伊信仰。1956年，因为司徒先生需要进行治疗，他们不得不返回美国。1957年，在返回香港的途中，司徒先生因医治无效在东京逝世，被安葬于横滨国际公墓。由于身体十分虚弱，司徒夫人原本可以选择到气候更加温暖的新西兰去完成十年远征计划的使命，但她仍然留在香港。直到1963年，她离开香港，定居于加利福尼亚伯灵格姆。1956年2月12日，有四个人在香港接受了巴哈伊信仰，成为殖民地的第一批巴哈伊。他们是纳里·舍瓦尼（Nari Sherwani）先生^①，吴英家先生，陈柳宝先生和他的双胞胎兄弟陈柳勋先生。香港第一个地方灵理会于1956年成立。

1953年10月，圣辅齐克鲁拉·哈德姆（Zikrullah Khadem）访问台湾。在这期间，有三个中国人，L.S.曹教授、吉米·洪利明先生和黄希伦先生在朱耀龙先生的家中的一次会面中接受了巴哈伊信仰。从那时开始，更多的中国人成为了巴哈伊。1955年，经过苏莱曼尼夫妇的努力传导，何成赐先生、C.C.程先生、C.C.白先生和约翰逊·萧在台湾成为了巴哈伊。1956年11月，第一届全台湾传导大会在台南召开，该会议由苏莱曼尼夫妇组织，阿格尼丝·亚历山大和其余四十名巴哈伊出席了会议。几个月后，台湾第一个巴哈伊夏令学校也在台南举办。同年7月，圣辅贾拉勒·哈泽（Jalál Khazeh）访问台湾。

1958年8月，蒋修宰先生（同样被称为Z.T.蒋约翰先

^① 现居爱尔兰，经常访问香港。

生^①)，一位澳门的巴哈伊，与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及儿子杰克逊访问了远离中国大陆、靠近越南北部边界的海南岛。由于岛上的政治氛围，海南人并无兴趣接受巴哈伊信仰。蒋修宰先生后被授予“巴哈欧拉的勇士”头衔。

①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三，第449页，卷十八，第738—740页。

十二 “智慧种族”

由于十年远征计划中拓荒者的努力开拓和早期信徒的自我牺牲精神，遍及各地的巴哈伊社团逐渐成立。这些接受巴哈欧拉信仰的早期信徒中，有许多是华人。到20世纪50年代，许多巴哈伊地方灵理会和社团业已成立。在十年远征计划之初，东南亚只有三个地方灵理会成立，即新加坡、古晋和索拉诺（菲律宾），以及总共不超过十个拥有巴哈伊居民的地方^①。1952年，第一个新加坡地方灵理会成立，1953年，英属婆罗洲（今沙捞越，东马来西亚）第一个地方灵理会在古晋成立。到1956年，已经有十三个灵理会成立：五个在印尼，四个在马来亚（今西马来西亚），两个在菲律宾，沙捞越和越南各有一个。1954年，第一个雅加达地方灵理会成立。1956年，韩国光州、香港维多利亚和台湾台南各自成立了第一个地方灵理会。1957年，文莱的文莱城第一个地方灵理会成立。1958年，澳门第一个灵理会成立，第一个台湾巴哈伊中心在台南成立。1958年9月，由圣护召集的最后一届洲际巴哈伊会议原计划在雅加达举行，但在会前一周会议许可被取消，不得不转移至新加坡举行。圣辅兼国际巴哈伊委员会^②秘书勒罗伊·约纳斯（Leroy Ioas）先生代表圣护出席会

① 参见《巴哈伊世界》卷十三，第301—304页。

② 第一个早期巴哈伊国际机构，1951年1月9日由守基·阿芬第指派。

议。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一些意义深远的事情，包括观看巴哈欧拉的画像，还有许多人成为巴哈伊的消息：他们既有来自沙捞越和文莱的华人，也有菲律宾人、日本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既有棕色人种，也有黄色人种。1959年，柬埔寨金边第一个地方灵理会成立。早期的中南半岛信徒大多是印度支那人而不是华人^①。李芝明^②先生是在柬埔寨接受巴哈伊信仰的为数不多的华人之一，也是金边第一个地方灵理会和香港巴哈伊第一届总灵理会的成员。在十年远征计划结束之际，东南亚已经有750个巴哈伊中心，其中一半以上已经成立了地方灵理会。

截止那个时期，各地许多华人正在成为巴哈伊，尤其在马来西亚。第一次中文传导大会于1966年在马来西亚的怡保市举行^③。许多早期华人信徒参加会议，如黄陈盛先生、罗添生先生、吴先生（太平地方灵理会的主席）、特雷莎·徐夫人^④和杨才来先生。这些早期的传导活动，使得更多当地人成为巴哈伊，更多地方灵理会成立，并且推动成立了许多强大的总灵理会，例如1964年马来西亚巴哈伊首个总灵理会成立时，圣辅“阿玛图-巴哈”鲁希叶·哈努姆代表世界正义院出席会议；1967年，台湾第一届总灵理会进行选举。到1971年，新加坡已经有五个灵理会成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新加坡巴哈伊总灵理会进行第一次选举，圣辅贾拉勒·哈泽先

① 依据约翰·福斯达私人通讯。

② 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移居香港，是巴哈伊国际共同体委员会早期驻中国成员。

③ 参见《马来西亚巴哈伊新闻》卷二，第2本，马来西亚巴哈伊总灵理会出版社，第13—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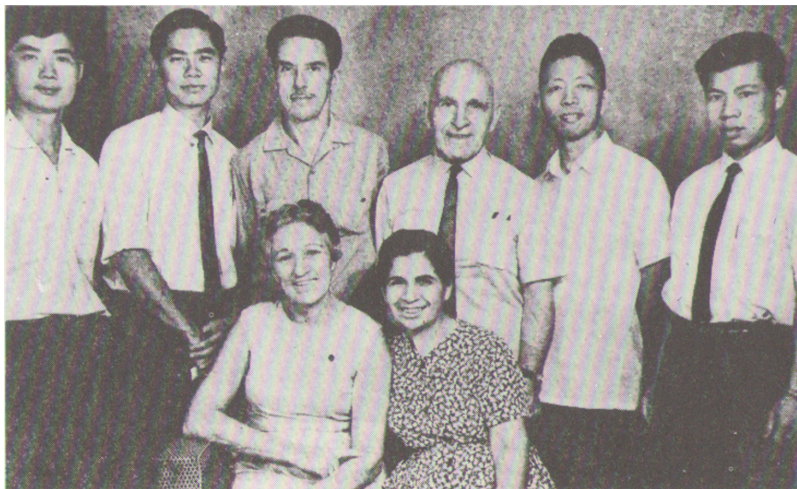
④ 袁其良之女，现在是辅助团的成员。



1964年里兹万，马来西亚巴哈伊第一届国家灵理会成立。坐者（从左到右）：格蕾塔·福斯达夫人、圣辅“阿玛图-巴哈”鲁希叶·哈努姆（世界正义院代表）、李乔治夫人、玛乔丽·福斯达夫人。站者（从左到右）：袁其良先生、郎·哈伦先生（Harlan Lang）、约翰·福斯达先生、梁达姆先生、米诺·福斯达先生、陈殷生先生。



1964年，文莱巴哈伊第一届总灵理会



1967年里兹万节，巴哈伊教台湾首届总灵理会成立。（图中少一成员）
站者（自左至右）：郭荣辉先生（Kuo Rong-hui）、严哲雄先生（Robert Yen Chih-hsiung）、丁信力博士（Dr. Sidney I. Dean）、苏莱曼尼先生、曹开敏先生（Tsao Kai-min）、王桢民先生（Wang Tseng-min）。坐者（自左至右）：伊莎贝拉·丁女士（Isabelle Dean）、里兹万尼叶·苏莱曼尼女士。



1974年里兹万节，巴哈伊教香港首届总灵理会。坐者（自左至右）：顾问胡达拉姆·佩曼先生、圣辅“阿玛图-巴哈”鲁希叶·哈努姆（世界正义院代表）、顾问袁其良先生、拉赫米·戴特瓦尼夫人。站者（自左至右）：李芝明先生（Chester Lee）、希斯马图拉·阿齐兹先生、查尔斯·邓肯先生、阿塔尔先生（Attar）、吉安·戴特瓦尼先生、叶颖超先生（Lawrence Ip）、大卫·霍克森先生（David Hockson）、汤姆·拉内先生（Tom Lane）。



1972年里兹万节，巴哈伊教新加坡总灵理会。坐者（自左至右）：希琳·福斯达夫人、顾问胡达拉姆·佩曼先生、圣辅贾拉勒·哈泽先生（世界正义院代表）、顾问袁其良先生、顾问切理·孙臣先生。站者（自左至右）：肯内特·马克先生（Kenneth Mak）、陈莉娜夫人、李乔治夫人、王露丝太太、张玉龙（隆）先生、马查布先生（Machambo）、爱德华·张先生（Edward Teo）、妮塔·孙臣小姐（Nita Sundram）、亨利·王先生（Henry Ong）。

生代表世界正义院出席会议。1974年，香港总灵理会成立，“阿玛图-巴哈”鲁希叶·哈努姆代表世界正义院出席会议。

1971年1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洋洲会议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大厅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世界正义院首次强调向华人进行传导的重要意义。在此次会议的致辞中，他们说到：“在拓荒者和旅行传导者遍及东南亚所有国家时，必然出现大量会讲中文的信徒，他们将吸引众多有智慧的华人信奉并服务于巴哈欧拉的信仰。中国人民的精神命运现在已经确定，传导指令将付诸实施。”自从那次历史性的会议之后，向华人传导的事业变得更加充满活力和富有前景，遍布这些地区的许多华人成为信徒。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远东和澳大利亚，向中国人传播巴哈伊信仰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十三 中国——最后的处女地

然而，直至1989年6月25日世界正义院发出一封重要的电讯之时，面向中国大多数人口的这个舞台才搭建起来。那封信中说到：“推动巴哈伊信仰在中国发展的事业已经一步步展开。世界正义院认为，在中国人民生活环境和自身兴趣允许的情况下，巴哈伊信仰的知识在中国大陆得到尽可能快速和广泛的传播是合乎时宜的。”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巴哈欧拉的信仰终于再次被闻知。在一封稍早的日期为1989年4月19日的信中，世界正义院强调：“作为巴哈伊，我们已经肩负着把巴哈欧拉的启示传达给全人类的重任，然而向人口庞大的中国进行传导工作仅仅是一个微小的开端。世界正义院认为，必须将这个任务视为整个巴哈伊世界最优先的任务之一。”

参考书目

H.D. Baker. *Chinese Family and Kinship*.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79.

H.M. Balyuzi. *Bahá'u'lláh, the King of Glory*. George Ronald, Oxford, 1980.

H.M. Balyuzi. *Eminent Bahá'is in the time of Bahá'u'lláh*. George Ronald, Oxford, 1985.

M.R. Garis. *Martha Root: Lioness at the Threshold*.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83.

Malaysian *Bahá'í News*. Publisher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is of Malaysia.

Milton Osborne. *Southeast Asia: All Illustrated Introductory History*. Allen & Unwin, Sydney, 1988.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Notes on the Chronology of Bahá'is in Chin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86 and 9 March 1990.

Mona Gabriel-Seow. *Spiritual Realit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Beliefs And The Similarities To The Bahá'í Fait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Bahá'í Studies Australia National Conference,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1989.

Jimmy Seow. *Chinese Culture and Teaching The Bahá'í Faith*.

Proceedings of the Bahá'í Studies Conference 1987. Publish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Bahá'í Studies (Australian Committee), pp.1 -11 .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70.

Star of the West Vol.13, 21. George Ronald, Oxford, 1984.

Jonathan D. Spence.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Penguin Books, U.K., 1982.

The Bahá'í World Vol.II-XV, XVII, XVIII.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Witold Rodzinski. *The Walled Kingdom: A History of China from 2000 BC to the Present*. Fontana Paperbacks, London, 1984.

作者简介

萧有发博士195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城，祖籍中国。他成长于一个有佛教背景的华人之家，1970年在槟榔屿接受了巴哈伊信仰。1975年至1976年，他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亚大学读书，1977年转入新西兰汉密尔顿的怀卡托大学学习，获得土壤科学和环境管理学博士学位。1981年他返回马来西亚，后在新加坡充任地球物理学顾问。1981年他移居澳大利亚，从事地震学的工作。他曾经是西澳大利亚矿业部所属石油部门的高级环境官员，获得珀斯西澳大利亚大学植物营养和地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属于地学、地貌学和地表水文学领域。萧有发博士曾服务于许多国家的全国和地方巴哈伊委员会，在亚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地区就巴哈伊信仰的诸多方面发表过大量演说。他还是《环境——我们共同的信仰》和《通往黎明之路》两本书的作者。萧有发博士现为西澳大利亚辅助团对华人传导助理、科克本市巴哈伊地方灵理会成员以及巴哈伊对华传导中心成员。

社会简评

“萧有发博士写的这篇文献，对于任何想追溯远东地区华人巴哈伊传播史的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它竭尽所能地将巴哈伊信仰的发展——那些勇敢的早期信徒执行巴哈欧拉使命的零星分散的踪迹——编录成册。

虽然在亚洲居住了二十年，但我也是从《20世纪一代圣洁的拓荒者》（*The Pure in Heart*）这本书中了解到了第一个在中国居住过的巴哈伊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得知第一位中国土生土长的巴哈伊——北京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博士，以及第一个将巴哈欧拉的书简翻译成中文的廖崇真先生。他们连同其他人的名字，消除了我在走向世界新秩序的孤独旅程中的疑虑。这新秩序的成员中将包含心灵纯真且喜欢探索真理的中国人。你也会发现，从这篇内容丰富的祷文中，你会得到很多欣喜。”

迈尔克·邦德（Michael Bond）^①

1990年9月14日

① 迈尔克·邦德，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讲师，前香港巴哈伊总灵理会的成员。

“努力追溯早期中国传导发展过程的尝试，是真正令人钦佩和值得赞美的。这份无所畏惧的努力，无疑成功地将过去的努力和当前将这个种族带入巴哈伊信仰的这个全球性的使命紧密联系起来……”

国际中文传播委员会

1990年9月22日

“追溯巴哈伊信仰在中国和‘南洋’地区的成长和发展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对以后的学者来说，这是开创性的努力和基本的原始资料。”

马来西亚巴哈伊国家灵理会

1990年9月15日

“毋庸置疑，它（指本书）将鼓舞着无数灵魂加倍努力，将巴哈欧拉令人欣慰的启示传达给中国人民。”

巴哈伊国际社团中国委员会

1990年10月15日

本书版权归萧有发先生所有
译自澳大利亚巴哈伊出版社1991年英文版

20世纪一代圣洁的拓荒者

——巴哈伊信仰在中国、东南亚和远东地区

The Pure in Hear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ahá'í Faith in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Far East

著者：萧有发

译者：陈思宇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

遵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